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二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一〇年十二月

畢士博、李濟與「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

洪廣冀*

在中國近代考古學史的書寫上，李濟與袁復禮於一九二六年之西陰村考古發掘以「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著稱；然而，少有研究者細究李濟在其發掘報告中明言的「最感謝的人」：畢士博 (Carl W. Bishop, 1881-1942)。本文以畢士博於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考古調查為中心，立基於目前典藏在賓州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館、史密森研究院檔案館、弗利爾藝術館與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的史料，試著釐清此失落的環節。曾受哥倫比亞大學與哈佛大學人類學與考古學訓練的畢士博，之所以於一九二三年三月來到中國，目的在於執行史密森研究院的科學合作計畫，即與中國學術社群密切合作，開挖境內具潛力的考古遺址，並平分發掘所得。不過，當畢士博試著與北京的學術社群聯繫、從而推動史密森研究院的前述構想時，他卻發現，由於中國地質學會已與歐美學術機構發展出一定的合作模式，史密森研究院於此並無太大的發揮空間。於是，至一九二七年四月間，即畢士博完成第一階段田野考古、啟程返美期間，畢士博的心力便花在突破前述合作模式、建立以史密森研究院為中心的網絡上。即是在這樣將中國打造為值得研究及可以研究之田野的過程中，他接觸到甫取得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的李濟。在一系列針對經費、設備、發掘所得是否留在中國、學術貢獻之歸屬的協商後，西陰村的考古發掘方成為現實。受惠於晚近科學史及科技與社會學界就行動者網絡、拼裝等概念的研究成果，本文認為，一旦研究者從本體論的立場思索到底什麼是田野，而不是僅將之視為科學實作發生的舞臺，他們不僅能回答田野為何能成為科學知識生產的重要場域；就中國科學史的研究史而論，研究者也更能凸顯近代學術於中國建制過程中的異質與眾聲喧嘩。

關鍵詞：畢士博 李濟 考古學 田野工作 拼裝

---

*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本研究承蒙 D. Kim Foundation、科技部計畫 (106-2410-H-002-177-MY2) 與臺灣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NTU-107L901004) 提供研究經費。

洪廣冀

一・前言

一九二七年，時年三十一歲的哈佛人類學博士李濟 (1896-1979) 出版《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一書。他如此定位該書於中國考古學的地位：

> 《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是一篇純科學的現代考古發掘報告，是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的初步總結。發掘是著者和袁復禮於 1926 年冬在山西夏縣進行的，報告作為清華學校研究院的院書第三種於 1927 年出版。[1]

在當前中國考古學史的書寫上，研究者少有質疑李濟的自我定位，進而將李濟與袁復禮一九二六年的西陰村考古發掘視為中國現代考古學史的開端。[2] 即便如此，除了仔細爬梳兩人採用的方法、重要發現、該發掘與李濟日後主持之安陽發掘間的關聯外，研究者還未探究李濟在《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中明言的「最感謝」的人——「弗利爾藝術館的收集員畢士博先生」：

> 他所注重的是科學的考古，代表的是那史密森研究院的一句格言的真精神——「為了知識的增進」；不是那尋常的古董收集者。他的始終不懈的贊助才能使這次的發掘告一個相當的段落。[3]

本文便是以這位「代表史密森研究院之真精神」的畢士博 (Carl W. Bishop, 1881-1942) 為中心，立基於目前典藏在賓州大學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館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史密森研究院檔案館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chives)、弗利爾藝術館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美國自然史博物館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等處的外文史料，具體而微地

---

[1] 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1927；收入張光直、李光謨編，《李濟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 2 卷），頁 169。

[2] 例如，在《新史學之路》的「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一章中，杜正勝表示「中國人的科學考古當從 1926 年李濟發掘西陰村算起，至今超過七十年」，見杜正勝，《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2004），頁 174。關於李濟於中國考古學史與學術史中的地位，相關著作見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北京：三聯書店，1997）；王汎森著，王曉冰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2013），特別是收錄在該書頁 377-416 的〈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臧振華，〈李濟與殷墟發掘：一個學術史的透視與省思〉，李永迪主編，《紀念殷墟發掘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9-24；岱峻，《李濟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李光謨，《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查曉英，〈「正當的歷史觀」：論李濟的考古學研究與民族主義〉，《考古》6 (2012)：82-92。

[3] 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收入張光直、李光謨，《李濟文集》第 2 卷），頁 169。

說明誰是畢士博、他與史密森研究院及弗利爾藝術館間的聯繫、此聯繫如何把畢士博送到中國、畢士博採用何種手段以推動上司交付的任務、李濟是如何——又為何——受到畢士博「始終不懈的贊助」等。在問題意識上，本文呼應戴麗娟就中國地質學史的觀察：「……這些作品從人物、教研機構、學會、期刊等方面入手，雖然已經累積不少成果，但是由於其出發點是以『建制化完整』的『中國』地質學史的角度進行論述，所以敘述多集中在中國籍學者身上，而那些非屬於中國的，或是建制化初期異質的、建制後被邊緣化的面向，即使在學科初建時曾經扮演重要角色，還是被忽略。」[4] 立基在其對法國古生物學者德日進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 的精細研究，戴麗娟強調從「世界史前史」、「國際考古學」乃至於「不同參與國的角度」來分析「中國考古發展的必要性」。畢竟，戴麗娟強調：「若沒有外籍學者和國外基金會在知識、技術和資金上的協助，以當時中國考古科學的發展條件和國家財務狀況，如此龐大的發掘計畫幾乎是不可能啟動，即使啟動，恐怕也無法貫徹到底，更不用談到成果的累積。」戴麗娟主張，一旦研究者能聆聽近代科學於中國生根與傳播之際的眾聲喧嘩，研究者「不僅可以瞭解外國研究者如何組織其在中國田野的考古工作，以評斷不同組織方式對中外相關學術發展的利害得失，也可避免從中國本位的眼光來回顧這段原本具有國際性格的發展過程，逕將外國考古者一律視為掠奪者，因此忽略實質且客觀的研究」。[5]

本文的首要目的即是要「避免從中國本位的眼光來回顧這段原本具有國際性格的發展過程，逕將外國考古者一律視為掠奪者」，從而「實質且客觀」地研究畢士

[4] 戴麗娟，〈中國地質學及史前學發展初期之國際性格：從德日進寄至法國的一張餐卡看起〉，《古今論衡》25 (2013)：133-166；引文出自頁 139。

[5] 戴麗娟，〈周口店發掘時代的一名法國顧問——以新近出版的德日進書信集為基礎材料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 (2008)：95-161；引文出自頁 101。與戴麗娟的見解相呼應的是沈德容 (Grace Yen Shen) 的 *Unearthing the Nation: Modern Geology and 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沈德容強調，既有就中國地質學史的研究往往從現代化的角度出發，將科學傳播 (scientific transfer) 視為關鍵指標。沈德容認為，儘管科學與中國近代化的歷程息息相關，此取向傾向將科學視為「客觀、可運輸之物」(an objective, portable thing)，僅聚焦在「真實科學」如何於民國時期之中國複製，忽略社會行動者往往賦予「科學」一詞多元的意義，從而失於探討科學在「想像與再想像中國之現代性」(imaging [and reimaging] Chinese modernity) 中的角色；見該書頁 5。

博代表之「史密森研究院」的角度。[6] 之所以強調是「史密森研究院」的角度，理由在於，我感興趣者並非在卓然有成的「法國角度」與「瑞典角度」外再增添一個「美國角度」。相反的，呼應後殖民研究者恰克拉巴提 (Dipesh Chakrabarty) 所稱的「地方化歐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地理學者李文斯頓 (David Livingstone) 的「將科學置於其地」(putting science in its place) 以及晚近研究者對巴薩拉 (George Basalla) 提倡之「擴散說」(diffusionism) 的批評與修正，我認為，與其說本文是在闡發一種「美國角度」，倒不如說是在揭露畢士博所任職的史密森研究院，以及該院所座落的地方，是如何讓畢士博的中國考察成為可能。[7]

讓我先將史密森研究院、畢士博等本文主角「置於其地」。一八四六年，史密森研究院在英國紳士史密森 (James Smithson, 1765-1829) 捐贈給美國政府的一筆遺產上成立，以促進「人類之間的知識增進與散播」(the increase and diffusion of

[6] 在戴麗娟所稱「中國本位」的考古學史書寫中，畢士博也一度被視為掠奪者，須對著名之昭陵六駿的颯露紫和拳毛騧兩駿的流失負責。不過，在 *Through Time, Across Continents: A Hundred Years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at the University Museu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Muse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3) 中，外格拉德 (Dilys P. Winegrad) 主張，從典藏於賓大博物館的畢士博相關史料來看，儘管畢士博於一九一〇年代的確以賓大博物館職員身分前往中國考察與收購文物，畢士博與兩駿的流失毫無關聯——畢士博不過是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這批賓大博物館購自盧芹齋手中的珍貴館藏而已；見該書頁 63-68。

[7]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David N. Livingstone, *Putting Science in Its Place: Geograph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關於類似將科學予以在地化的探討，經典文獻見 Adi Ophir and Steven Shapin, "The Place of Knowledge: A Methodological Survey," *Science in Context* 4.1 (1991): 3-22; Steven Shapin, "Here and Everywher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1995): 289-321；晚近的回顧文章見 Richard C. Powell, "Geographies of Science: Histories, Localities, Practices, Futur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1.3 (2007): 309-329; Simon Naylor, "Historical Geography: Knowledge, in Place and on the Mov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5 (2005): 626-634；洪廣冀，〈科技研究中的地理轉向及其在地理學中的迴響〉，《地理學報》83 (2016)：23-69。至於擴散說，參 George Basalla, "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 A Three-Stage Model Describes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Science into Any Non-European Nation," *Science* 156.3775 (1967): 611-622；關於擴散說的批評，見 Marwa Elshakry, "When Science Became Western: Historiographical Reflections," *Isis* 101.1 (2010): 98-109; Fa-ti Fan, "Science in Cultural Borderlands: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Science, European Imperialism, and Cultural Encounter,"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2 (2008): 213-231; Kapil Raj, "Beyond Postcolonialism and Postpositivism: Circulation and the Global History of Science," *Isis* 104.2 (2013): 337-347 等。

knowledge among men) 為宗旨。成立之初，該研究院的定位類似圖書館與學術出版社，與其日後聞名的博物學研究與博物館管理相當不同。史密森研究院的轉型係拜美國社會於一八四〇至五〇年代間急遽的西部擴張之賜。在該院副秘書長貝爾德 (Spencer F. Baird, 1823-1887) 的籌劃下，史密森研究院積極參與由聯邦政府策動的一系列科學調查與探險（如美墨邊境調查[1848-1855]、太平洋鐵路調查[1853-1855]、日本探險[1852-1854]、北太平洋探險[1853-1856]），一方面藉此收集大量博物學與民族學標本，從而躍身為美國首屈一指之「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另方面則成為政府推動其科學政策時的左右手。那麼，為何史密森研究院會決定跨足中國考古學？這就涉及「美國東亞藝術收藏的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 of East Asian art collecting in America, 1893-1919) 的關鍵行動者：底特律富商與藝術收藏家弗利爾 (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一九〇六年，在總統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 的穿針引線下，弗利爾決定死後要將其藝術收藏捐給國家（1906 年時已逾 2 千件；至 1919 年弗利爾過世之際已累積至 3 萬件），由史密森研究院負責管理。並且，考慮到史密森研究院自設立以來的研究重心始終是博物學，他允諾將協助該院建立一座能與波士頓美術館、紐約大都會美術館等機構比肩齊驅的藝術館。至其一九一九年過世之際，弗利爾前後捐了一百五十萬美元以為該藝術館之建造經費，並在遺囑中詳列此「弗利爾藝術館」的使命。除了系統地展示其收藏、讓美國民眾能體會東亞藝術之美外，弗利爾規定，該館每年得自其遺產中取出十萬美元以為該館「遠東文明」的研究經費，透過具體的研究、調查與出版以促進美國民眾關於「美之高度理想」(high ideals of beauty) 的理解。[8] 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生於日本 (1881)、於哥倫比亞大學完成人類學碩士學位 (1913)、於哈佛大學的匹巴迪考古學與民族學博物館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受考古學洗禮 (1913-1914)、以賓州大學博物館東方部的副主任 (assistant curator) 之身分領導中國考古工作 (1915-1917) 的畢士博得以出線，在史密森研究院在經費與制度的奧援下，於一九二二年起領導該院於一八四六

[8] 見 Warren I. Cohen, *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64；關於弗利爾的生平及其對美國藝術史的貢獻，見 Thomas Lawton and Thomas W. Lentz, *Beyond the Legacy: Anniversary Acquisitions for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the Arthur M. Sackler*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8); Kathleen Pyne, "Portrait of a Collector as an Agnostic: Charles Lang Freer and Connoisseurship," *The Art Bulletin* 78.1 (1996): 75-97。

年成立以來首度的中國考古考察。[9] 本文主張，一旦我們將史密森研究院的歷史考慮在內，以畢士博為個案的研究，不僅能如戴麗娟所建議的，從「不同參與國的角度」來分析「中國考古發展的必要性」，同時也能將史密森研究院此「國立機構」的科學活動放在跨國脈絡中考察。[10]

本文另一對話對象則涉及田野科學史之研究史 (historiography) 的根本問題。相較於發展逾三十餘年、已卓然有成的實驗室研究或博物館研究，科學史及科技與

[9] 關於畢士博的生平，可見其好友威爾博 (C. Martin Wilbur) 撰寫的悼念文：“In Memoriam: Carl Whiting Bishop,”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2.2 (1943): 204-207；另一值得參考者為紐梅爾 (Sarah L. Newmeyer) 就畢士博照片檔案的介紹：“The Carl Whiting Bishop Photographic Archive i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 Resourc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Archaeology, Geology, Topography, Flora, Fauna, Customs, and Cultur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82.1 (1987): 23-28。持平說來，目前歐美學界就畢士博的研究大約不脫該文簡歷式的描述，以畢士博為主題的研究仍付之闕如。晚近提及畢士博的美國考古學史與美術史的研究包括：Karl Ernest Meyer, *The China Collectors: America's Century-Long Hunt for Asian Art Treasur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96, 112, 252; Lara Jaishree Netting, *A Perpetual Fire: John C. Ferguson and His Quest for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97-198; Guolong Lai, “Digging up China: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ism in the Yinxu Excavation, 1928-1937,” in *Unmasking Ideology in Imperial and Colonial Archaeology: Vocabulary, Symbols, and Legacy*, ed. Bonnie Effros and Guolong Lai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Press, 2018), pp. 83-119。最後值得一提者為布朗 (Clayton Brown) 的博士論文：“Making the Majority: Defining Han Identity in Chinese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2008)。布朗亦使用了目前典藏在史密森研究院的畢士博相關史料——只是，他僅提及畢士博的生平（如前引美國考古學史的著作），而把重點放在李濟、傅斯年等人對畢士博的批評（然其成果並沒有超出前引杜正勝、王汎森的研究成果）。此外，也必須指出，即便從博士論文的標準，該論文也難說是個完整的研究——不僅結構相當鬆散，若干附註、章節與結論尚未完成。

[10] 戴麗娟，〈周口店發掘時代的一名法國顧問〉，頁 101。以史密森研究院為主角的研究，見 Sally Gregory Kohlstedt, “Place and Museum Space: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American West,” in *Geographies of 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 ed. David N. Livingstone and Charles W. J. Wither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pp. 399-438; Pamela M. Henson, “Spencer Baird's Dream: A U.S. National Museum,” in *Cultures and Institutions of Natural History: Essay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 Michael T. Ghiselin and Alan E. Levito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2000), pp. 101-126；關於北美博物館的歷史，關鍵著作見 Sally Gregory Kohlstedt, “‘Thoughts in Things’: Modernity, History, and North American Museums,” *Isis* 96.4 (2005): 586-601; Karen A. Rader and Victoria E. M. Cain, *Life on Display: Revolutionizing U.S. Museums of Science and Natural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社會的研究者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才開始思考「田野」此「科學地點」(scientific site) 是否有其歷史，以及以「田野」為主題之科學史是否能如實驗室研究一般，揭露田野為一處「支點」，讓科學家得以輕鬆施力，從而「舉起全世界」。不過，田野科學史發展至今，研究者關心的還是「田野上」發生的採集、觀察、描述、分類等實作，乃至於該實作與博物學、分類學、生態學甚至生物醫學之知識建構的關聯。從地理學的角度，這樣的分析方式毋寧是把「田野」當成舞臺，忽略此「舞臺」之所以成立、之所以能成為社會學者基瑞 (Thomas F. Gieryn) 所說的「真實點」(truth spot)，往往涉及一系列更精巧——但往往更隱晦與瑣碎的——的空間實作。[11] 有鑑於此，本文主張，田野科學史的研究者有必要把分析視野從「行動者在田野中做什麼事」轉移到「行動者如何把田野做出來」。依據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的定義，“field” 與 “wilderness” 或 “woodland” 等土地類型的差別便是該土地必須是被開墾或耕作過的 (cultivated) ——因此，當以英語為母語者稱科學家從事觀察與實驗的「場所」為 “field” 時，該用法已然暗示該「場所」必然不是自然而然、而是需要被培育 (cultivated) 的。[12] 本文關心的即是此「培育」的過程。透過大量畢士博與李濟間的通信，我將會把重點放在兩造間的對話、協商、衝突、欲言又止、欲拒還迎等面向，乃至於李濟所稱之「始終不懈的贊助」的具體內容。

在理論上，本文期待，如此將田野培育視為研究對象、進而在本體論上追問「田野是什麼」的取向，除了可為田野科學史作出貢獻外，也可與晚近開始在科學史研究中引發迴響、堪稱「行動者理論 2.0」的視野展開對話。熟悉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 之發展史的研究者不難發現，自兩千年以降，該理論重要的理論家與闡發者（如拉圖[Bruno Latour]、洛[John Law]等人）越來越不強調標準化 (standardization)、位於「計算中心」之科學家對於田野採集者與報導人的

[11] Thomas F. Gieryn, *Truth Spots: How Places Make People Believ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特別是第三章。關於田野科學史的重要文獻，見 Robert E. Kohler, *All Creatures: Naturalists, Collectors, and Biodiversity, 1850-195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Robert E. Kohler, “Finders/Keepers: Collecting Sciences and Collecting Practice,” *History of Science* 45.4 (2007): 428-454; Robert E. Kohler, “History of Field Science: Trends and Prospects,” in *Knowing Global Environments: New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Field Sciences*, ed. Jeremy Vetter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12-240。

[12] 見 http://www.oed.com/view/Entry/69922?rskey=jhgc5Q&result=1#eid (檢索 2017.12.16)。

「遠距控制」等在一九九〇年代廣受科技與社會學界歡迎的分析概念。[13] 受到德勒茲 (Gilles Deleuze) 與瓜塔希 (Félix Guattari) 之著作的啓發，論者主張，即便行動者網絡理論成功地挑戰社會科學中往往與「能動性」(agency) 成對立之姿、且將「非人」(nonhuman) 排除在外的「結構」(structure) 概念，將之替換為一類無尺度、無內外、揉合行動者與行動體的拓樸學構造，這樣的行動者網絡還是過於結構。[14] 要將行動者網絡理論適當地予以升級，研究者建議有必要將行動者網絡視為「拼裝」(assemblage)，即研究者有必要正視行動者或行動體的背叛、行動者網絡的崩潰與裂解、計算中心的一籌莫展或坐困愁城、遭到控制之行動者／行動體的恃寵而驕甚至陽奉陰違等。[15] 本文擬加入此在人文社會科學界中方興未艾的討論，並為美國視角下的中國考古學史研究做出貢獻。

以下篇幅便依序說明畢士博於一九二三年以弗利爾藝術館副館長之身分來華後的一系列活動，包括一九二三年嘗試介入河南新鄭的考古發現；一九二四年與北京歷史博物館於河南信陽的發掘；一九二五年招募李濟為弗利爾考古團隊的一員；同

[13] 見拉圖於二〇〇五年為行動者網絡理論所撰寫的教科書：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關於「遠距控制」，見 John Law, "On the Methods of Long Distance Control: Vessels, Navigation and the Portuguese Route to India," in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 John Law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1986), pp. 234-263；關於該概念在科學史中的應用與修正，見 Lissa L. Roberts, "Situating Science in Global History: Local Exchanges and Networks of Circulation," *Itinerario* 33.1 (2009): 9-30。

[14] 關於行動者網絡的拓樸學，見 Bruno Latour, "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Move the World," in *Science Observed*, ed. Karin D. Knorr-Cetina and Michael Mulkay (London: Sage, 1983), pp. 141-170; Bruno Latour, "On Actor-Network Theory: A Few Clarifications Plus More Than a Few Complications," *Soziale Welt* 47 (1996): 369-381; Annemarie Mol and John Law, "Regions, Networks and Fluids: Anaemia and Social Topolog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4.4 (1994): 641-671；關於行動者網絡理論與拼裝觀間的異同與可能的匯通，見 Martin Müller and Carolin Schurr, "Assemblage Thinking and Actor-Network Theory: Conjunctions, Disjunctions, Cross-Fertilisation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1.3 (2016): 217-229。

[15] 研究者一直到相當晚近才開始探索拼裝觀於科學史研究中的應用。具體表現為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於二〇一七年六月出版「打破科學網絡」(breaking scientific networks) 之專號；見 Dániel Margócsy 為該專號撰寫的導論："A Long History of Breakdowns: 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7.3 (2017): 307-325 及專號內 Andrew Lakoff 的文章："A Fragile Assemblage: Mutant Bird Flu and the Limits of Risk Assessment,"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7.3 (2017): 376-397。

年於大同方山展開的考古發掘；一九二六年資助李濟與袁復禮展開汾河流域的考古調查，以及同年由兩人主導的西陰村發掘；一九二七年四月畢士博返國，由李濟擔任弗利爾藝術館之中國考古計畫的田野負責人等。在處理前述由畢士博推動的考古調查與發掘時，我會詳述畢士博採取的步驟、執行方式及後果，並將之放在畢士博所處的人際網絡中考察。在體裁方面，本文採用目前科學史論文寫作中已較為少見的傳記體。之所以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涉及，本文採用的材料，如不是畢士博與華盛頓總部間的通訊，便是與同儕、親友交流的私人信件。在逐封詳讀與謄寫這些信件、並建立資料庫後，我認為，這批檔案不僅能讓研究者看見二十世紀初期中國考古學界的運作實態，更能讓研究者「深厚地描述」如戴麗娟所稱的，藉由書信來觀察外國學者「在長期駐留中國田野後，在工作心態、科學思考，乃至於實際操作上的轉變」。[16] 另方面，本文也希望凸顯哲學家德蘭達 (Manuel DeLanda) 的期許，即拼裝觀的研究者須自我提醒，以拼裝觀為出發點的經驗研究，不能只描述拼裝的狀態，更重要者，是要揭露拼裝的過程及牽連的各類實作。[17] 本文希望，以傳記體的書寫手法，搭配拼裝觀的視野，不僅足以顯示畢士博的考古實作為田野科學史帶來的洞見，同時也能彰顯中國考古學史中「非屬於中國的，或是建制化初期異質的、建制後被邊緣化的面向」。[18]

二・「系統的考古研究」

一九二三年二月初，時年四十二歲的畢士博及其助手董光忠[19] 自華盛頓啟程，

[16] 戴麗娟，〈周口店發掘時代的一名法國顧問〉，頁 141。關於傳記體於科學史研究的嘗試，亦見 Janet Browne, *Charles Darwin: The Power of Place* (New York: Alfred Knopf, 2002)；李尚仁，《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臺北：允晨文化，2012）；相關理論討論見 Theodore M. Porter, "Is the Life of the Scientist a Scientific Unit?" *Isis* 97.2 (2006): 314-321。

[17] 德蘭達指出，當德勒茲與瓜塔希提出「拼裝」的概念時，其使用的詞彙是 "*agencement*"，即「拼裝」指的不僅是拼裝的成果，還包括把各類異質成分 (component; *agencer*) 組合在一起的動作。不過，當該詞彙被譯為 "assemblage" 時，德蘭達指出，研究者很容易忽略了拼裝的實作而僅關注在拼裝的結果本身；見 Manuel DeLanda, *Assemblage The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

[18] 戴麗娟，〈中國地質學及史前學發展初期之國際性格〉，頁 139。

[19] 畢士博於一九一五年結識董光忠。董光忠的語言能力，再加上如勤奮、機智與忠誠等特質，讓畢士博想到，若他能說服賓大博物館的管理階層，讓他把董光忠帶到費城受訓，督

正式啟動史密森研究院於一八四六年成立以來首度啟動的考古考察。畢士博的任務相當清楚。在一封致畢士博的信件中，弗利爾藝術館館長羅紀（John Ellerton Lodge, 1878-1942；於 1920-1942 年間擔任館長）寫道：(1) 畢士博須與中國政府與學者建立合作與互信關係；(2) 畢士博得與中國科學機構或個人合作，合法地開挖中國的考古遺址，並將部分所獲運回美國，交由弗利爾藝術館與波士頓美術館典藏；(3) 畢士博得在兩年的時間內完成前述任務，且花費得控制在六萬美金以內。[20]

畢士博感謝羅紀對他的信賴。事實上，雖說他曾以賓大博物館東方部副主任的身分主持中國考古考察，但此職業生涯的初試啼聲之作卻是以失敗告終。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當畢士博終於備妥物資、器具與人力，準備在是年年底前往西安試掘具潛力的考古遺址時，他收到來自賓大博物館的電報，表示賓大博物館無法支持畢士博的田野考古計畫，要他即刻返國。[21] 然這趟打著史密森研究院與弗利爾藝術館旗

促他熟悉博物館經營的目標與方式、學習英文等，說不定這位二十三歲的中國人可成為賓大博物館之中國考古團隊不可或缺的一員。一九一七年，當戈登同意董光忠以「特殊學生」(special student) 的身分在賓大博物館實習後，畢士博即將董光忠帶到費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間，當畢士博於中國服役時，董光忠白日在賓大博物館打雜，晚間則至語言學校學習英語。一九二二年，當畢士博決定轉換跑道、擔任弗利爾藝術館的副館長後，他亦說服羅紀聘用董光忠，董光忠是以成為史密森研究院創設以來首位中國職員。參見洪廣冀，〈中國即田野——畢士博及中國於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學術界的地位〉，《新史學》30.1 (2019)：117-166。相關史料見如下信件：Bishop to Gordon, December 25, 1915, Chengtu, Szechuan, Box 1, Folder 3; Bishop to Gordon, July 15, 1917, Peking, China, Box 1, Folder 5; Bishop to Gordon, December 12, 1917, Peking, China, Box 1, Folder 5；以上信件位於 *The Carl W. Bishop Papers*, The Penn Museum Archives, Philadelphia；以及 Bishop to John E. Lodge, July 17, 1921, 81 N. Washington Street, Tarrytown, New York; Bishop to Lodge, January 12, 1922, 81 N. Washington Street, Tarrytown, New York; Bishop to Lodge, November 7, 1922, location unidentified；三封信件均位於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1-1922," *Central Files* (1919-1986, SIA Acc. 03-018,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chives, Washington, DC)。

[20] Lodge to Bishop, August 24, 1923,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3," *Central Files.*

[21] Bishop to Gordon, December 12, 1917, Peking, China, Box 1, Folder 5, *The Carl W. Bishop Papers*. 賓大博物館的管理階層並不滿意畢士博做田野的方式與態度。管理委員會成員哈里森 (Charles C. Harrison, 1844-1929) 便表示，任命畢士博為該館之中國考古調查負責人自始便是個錯誤。他抱怨，從畢士博的信件來看，畢士博的「田野工作」盡是與在地政商名流遊山玩水；對博物館交辦業務之延宕，如不是歸咎天候便是人禍。見 Harrison to Gordon, November 10, 191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1, Folder 5, *The Carl W. Bishop Papers*；亦參見洪廣冀，〈中國即田野〉，頁 117-166。

號的中國考察會不會重蹈覆轍？畢士博認為不至於。關鍵在於，早在其啟程赴華前，畢士博即已耳聞中國考古學界早已不是故步自封的守舊派，而是於歐美受過完整學術訓練、心胸開放且樂於與外國學者合作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換言之，如果說畢士博的終極任務是與中國相關學術單位合作，依平等互惠的原則共享考古發掘所得，那麼中國的學術界似乎已成熟到可接受這樣的提議。[22]

讓我先簡述畢士博觀點下的中國學術社群。畢士博發現，由於與外國科研機構的合作已有先例可循，「史密森研究院於中國之考古考察」的協商進展地相當順利，他也很快地結識北京政治與學術名流，如丁文江、梁啓超、金紹城、裘善元、顏惠慶、顧維鈞、翁文灝、羅振玉等人。事實上，畢士博發現，他的困難不是找不到合作對象，而是有太多可合作的對象。北京以考古調查、文物保存為目的的機構林立（如地質調查所管理的博物館、教育部所轄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內政部所轄的藝術博物館等），彼此既互不從屬，也缺乏協調——換言之，畢士博認為，他很難在不傷害其他科研機構的感情下，逕自與某特定機構合作。在這樣的氛圍下，五月二十八日，丁文江出面召開會議，邀集北京政商與學術名流以及各考古科研機構負責人，商討與史密森研究院的合作事宜。畢士博與董光忠均受邀以「系統的考古研究」(systematic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為題發表演講。[23] 在一封致羅紀的信中，畢士博寫道，他希望能藉此告訴北京學術社群，由史密森研究院出資、他和董光忠負責執行的考古計畫，並非僅是個於「中國土地上的美國事業」(American enterprise on Chinese soil)，而是以中美兩國之密切合作為前提，追求兩國在科研上的共存共榮。[24]

兩人的演說廣受迴響，與會者隨即決議成立中國考古學會 (Archaeological Society)，由梁啓超、裘善元、金紹城、翁文灝等人為委員，以為弗利爾藝術館的對口單位。六月七日，該委員會邀請畢士博與董光忠前往地質調查所，商談與史密森研究院的具體合作事宜。畢趁此提出兩點疑問：其一為能否將掘得之文物運出中

[22] Bishop to Lodge, November 7, 1922,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1-1922," *Central Files.*

[23] Bishop to Lodge, May 28, 1923,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3," *Central Files.*

[24] Bishop to Lodge, April 16, 1923,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3," *Central Files.* 有趣的是，畢士博向羅紀表示，他是刻意地要求董光忠著中國服飾出席各類與中國人協商的場合。他強調，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向中國人表明，曾於賓大博物館見習數年的董光忠並非美國學術文化之模仿者，而是兼容西方與東方之學術訓練的「愛國的中國人」(patriotic Chinese)。

國，二為發掘地點。對此，委員會的答覆是，中國考古學會不會對畢士博何時、何處、以何種方式展開其考古調查等設下任何限制，但畢士博得承諾所得文物絕對不得運出中國。至於合適之考古地點為何，委員會建議，晚近地質調查所於仰韶村的發掘取得巨大突破，而史前考古學將會是該所後續的科研發展重點。因此，委員會建議畢士博不妨以廣西、浙江與福建為勘察地點。畢士博對此兩點決議均表示異議。委員會的最後決議為：(1) 畢士博得將發掘所得分為兩部分，由委員會挑選何部分該留在中國；(2) 委員會不會限制畢士博擬定的發掘地點——惟畢士博應將焦點放在「三代」以降，新石器時代乃至於更早的時期則交由地質調查所負責。[25]

畢士博對前述協商成果感到滿意。在與羅振玉、馬衡等人討論後，畢初步選定白馬寺、雲岡石窟、洛陽古城等處為可能考古發掘地點，並透過美國駐華外交機構之助，向外交部提出發掘申請。[26] 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五日間，在馬衡的陪同下，畢士博與董光忠前往龍門石窟、白馬寺等處從事初步的考古調查。該調查受到軍閥吳佩孚的支持，在多達二十五名士兵的保護下進行。不過，就在畢士博認為於中國「系統的考古研究」已是指日可待，他收到外交部的回文，指出「貴國博物院派代表來華考查中國古時文明程度，並擬與北京古物陳列所之官員以友誼接洽，用意甚盛；惟內務部以保管地方古物歷有成案，對於發掘一節未能照准」（標點為筆者所加）。如此斷然的回絕頗出畢士博的意料。[27] 在致羅紀的信件中，畢士博忿忿地寫道，仰賴文物出口獲利的古董商已滲透內政部，藉由排擠史密森研究院，他們得以獨佔文物出口的巨大利潤。[28]

於白馬寺、雲岡石窟、洛陽等處開挖的構想就此不了了之。一九二三年七月中旬，在美國駐華特命全權公使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薛曼（Jacob Gould Schurman, 1854-1942；在職期間為 1921-1925 年）的邀請下，畢士博前往山西考察雲岡石窟。畢士博發現，儘管無明顯遭到偷盜之痕跡，這堪稱北魏佛教藝術精華的藝術品，卻在天然（如沖蝕、風化）與人為（如當地村民於窟內築屋）的影響下岌岌可危。不過，畢士博發現，社會上普遍認為保存雲岡石窟已刻

[25] Bishop to Lodge, June 20, 1923,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3," *Central Files.*

[26] Bishop to Lodge, June 4, 1923,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3," *Central Files.*

[27] 該文件收於 Box 1, Folder 13,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1914, 1923-1942, SIA Acc. 02-051,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chives, Washington, DC)。

[28] 關於畢士博就內務部的評論，見 Bishop to Lodge, July 11, 1924,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4," *Central Files*。

不容緩——軍閥閻錫山甚至計劃出資二十萬美金來推動此事。有鑒於此，畢士博向羅紀提出一大膽的計畫：由弗利爾藝術館出資，雇人清除長年累積於窟中的淤泥、復原若干受損嚴重的雕像與浮雕、最後製作展示櫃加以保護並予以保存（畢士博甚至建議，如有必要，弗利爾藝術館可考慮收購臨近雲岡石窟的村落土地，輔導村民遷村）。經此整理後，畢士博認為，重見天日之雲岡石窟極有可能成為世界級的佛教朝聖地點，而來自世界各地的朝聖者當能為地方帶來相當收益。若羅紀認為此提議可行，畢士博指出，考慮到目前橫掃中國知識界的古蹟保存熱，中國當局當能因此體會弗利爾藝術館欲與中國當局合作、共同保護中國古蹟與文物的熱誠與決心。他有理由相信他可因此獲得內政部的發掘許可，甚至有機會能將數尊佛像運回弗利爾藝術館典藏。[29] 然此計畫並未獲得羅紀的認同。在其回信中，羅紀指出，姑且不論畢士博的計畫涉及複雜的政治協商與操作，出資者想必不會認為「以二十萬美金之代價取得發掘許可」為划算的投資。畢士博不要忘了，羅紀指出，他只有兩年的時間來完成史密森研究院交付的任務，且花費得控制在六萬美金以內。[30]

畢士博以雲岡石窟之保存與復舊來換取考古發掘許可的構想再次不了了之。九月五日，馬衡告知畢士博，河南鄭州新鄭縣附近，日前有農民於掘井時挖出一座「漢代古墓」。馬衡指出，目前該古墓發掘的指導者為軍閥吳佩孚，畢士博是否願意與他一同前往新鄭，一探究竟。[31] 畢士博一行人於翌日抵達鄭州，向駐守當地之吳佩孚的副將靳雲鶚表明身分後，便被引領至當地衙門審視已自該「漢代古墓」中掘出的文物。出乎畢士博意料，他看到多達七十件的青銅器——顯然的，此古墓的年代遠不是漢代，而是商代或周代。畢士博隨即向靳雲鶚表示，該古墓實為解開中國文明之「三代之謎」的關鍵——希望靳雲鶚能允許其前往現場勘察。靳雲鶚應允。抵達現場後，畢士博坐於一籃內，垂降入坑中考察。在以隨身攜帶的小刀 (pocket-knife) 略做翻掘後，他發現一枚頭骨、玉飾與陶片等。在對該古墓的規模有了初步認識後，畢士博向靳雲鶚表示，目前採用的發掘方式堪以「挖煤」來形容——發掘者可能就在無意間讓這百年難得一見的考古發現毀於一旦。畢士博指出，作為史密森研究院中國考古考察的負責人，他既有能力也有設備以「科學方

[29] Bishop to Lodge, July 21, 1923,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3," *Central Files.*

[30] Lodge to Bishop, August 24, 1923,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3," *Central Files.*

[31] Bishop to Lodge, September 5, 1923,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3," *Central Files.*

法」來開挖新鄭古墓。儘管認同畢士博的看法，靳雲鶚表示，他無法擅自決定——畢士博得親自請示吳佩孚才行。[32]

畢士博一行人隨即返回北京，一方面備妥發掘、製圖與照相工具，另方面致信美國的駐華外交機構尋求行政支援。在寫給駐在洛陽的美國外交人員蘇伊士 (C. T. Suez) 的信中，畢士博表示，新鄭古墓發掘為堪與英國人卡特 (Howard Carter, 1874-1939) 於一九二二年掘出的圖坦卡門 (Tutankhamun) 相比擬的重要考古發現。如要以金錢衡量的話，畢士博指出，北京古董商已向吳佩孚出價四十萬美金以收購掘出的三代文物——而據其對紐約、倫敦等主要藝術市場的了解，該批文物的價值絕對不只此數。畢士博接著簡述史密森研究院之中國考古考察的始末與目的，清楚表達要將部分新鄭文物運回弗利爾藝術館典藏的意願。畢士博希望蘇伊士能代其向吳佩孚美言幾句，讓他能在新鄭文物的發掘與典藏上做出貢獻。[33]

與之同時，畢士博亦去信吳佩孚：「對於掘採一事，略有經驗，甚願盡其綿薄」，且「甘效馳驅，純係公家任務和私人愛好，決無盜取之用心，亦不受薪金報酬。鐘鼎尊彝諸物出土後，如能拓印數紙，寄回美國展覽，區區之願已足」，如獲吳首肯，他準備「犧牲兩星期之光陰，指導一切」。[34] 吳佩孚給予畢士博肯定的答覆（吳的電報於二十日抵達畢士博手中）。畢士博一行人於二十一日抵達鄭州。在當地盤桓數天後（因當時靳雲鶚人在開封，其下屬不敢做主），畢士博等人於二十四日抵達新鄭，並拜會當地縣令。縣令表示他會派兵護送畢士博等人前往該古墓之所在地從事勘察——惟畢士博得允諾不得停留太久，因為他手邊只有三十名士兵，而有線報指出土匪正策劃攻城。畢於隔日前往新鄭，略事探勘後便返回鄭州（27日在衙門內拍攝已掘出的青銅器等文物，於 29 日返抵北京）。[35] 自始至終，畢士博均未有機會以「兩星期之光陰，指導一切」，遑論在「鐘鼎尊彝諸物出土後」，「拓印數紙，寄回美國展覽」。畢士博此行的最大收穫便是一組於新鄭及鄭州衙門內精心攝製的照片（圖一），以及設法夾帶的人類與動物骨骼。[36] 當然，單就羅紀

[32] Bishop to Lodge, September 19, 1923,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3,” *Central Files.*

[33] Carl Whiting Bishop to Mr. C. T. Suez, September 11, 1923, Peking, *Central Files.*

[34] 轉引自岱峻，《李濟傳》，頁 30。

[35] Bishop to Lodge, October 9, 1923,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3,” *Central Files.*

[36] 見畢士博致美國自然史博物館成員格蘭傑的信件：Bishop to Granger, October 9, 1923, Hotel de Pekin, Box 1, Folder 24, *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s Papers* (Circa 1919-1930s, Research

為畢士博設下的目的來看，畢士博這回欲跳過內政部等考古發掘的主管機關、直接與當地軍閥合作的嘗試可說是失敗的。

畢士博抵華以來協助組織中國考古協會、申請發掘許可、倡議文物之在地保存、於各考古遺址的探勘活動迅速引起中外古物收集者與文物商的注意。在一封致羅紀的信中，畢士博表示，儘管吳佩孚三令五申地禁止新鄭文物流入市面，還是有不少人向他兜售新鄭青銅器、隨葬玉器等文物。事實上，畢士博寫道，他已成功地購得一件自新鄭「偷出」的銅器，且該收購並未消耗藝術館太多的預算——因為將該銅器自新鄭發掘現場盜出兜售的賣主，深知此舉已犯下重罪，要求的正是像史密森研究院這樣「口風緊」的買主。[37] 在另封信中，畢士博報告已購得一批據稱是來自楚國舊都壽春的銅器。這批銅器是由瑞典鐵路工程師卡爾貝克 (Orvar Karlbeck) 蒐集，畢士博指出，原本預計的買主為斯德哥爾摩博物館，但因該館臨時缺乏資金，他趁機說服卡爾貝克以五百美金的價格轉售給史密森研究院。[38]

但這樣以收購為主、遊走於合法與非法間的文物徵集方式並不符合羅紀的期待——畢士博也深知此點。在每月一回、致羅紀的工作匯報中，畢士博反覆強調在「沒總統、沒副總統、沒首相、沒內閣——沒國家」(No President, no Vice-President, no Premier, no Cabinet—no country) 的局勢下，取得政府許可、從而「合法地」考古發掘就如同「以魚叉刺水母」(harpoon a jellyfish) 般地困難。[39] 即便如此，遠在地球另一端的羅紀，對於畢士博能否勝任「史密森研究院中國考古調查之領隊」、乃至於未來弗利爾藝術館的館長已感到懷疑。一九二四年，羅紀決定派遣一位中文名為文禮 (Archibald Gibson Wenley, 1898-1962) 的密西根大學畢業生前往中國，一者輔佐畢士博；再者確保目前陷入停滯的考古計畫能依原先規劃進行；三者為藝術館培養下一代的藝術管理人才。是年三月，羅紀更捎了封措辭嚴厲的信給

Library,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原文為 “I did get away with a good many bones”。

[37] Bishop to Lodge, March 10, 1924,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4,” *Central Files*。在另一封信中，畢士博向羅紀報告，古物市場上充斥著「來自新鄭的隨葬玉器」(tomb jades from Hsin-chêng Hsien)。見 Bishop to Lodge, March 19, 1924,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4,” *Central Files*。

[38] Bishop to Lodge, March 10, 1924,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4,” *Central Files.*

[39]「魚叉刺水母」出自 Bishop to Lodge, July 21, 1923, Peking；「沒總統」等評語則出自裘善元之口，見 Bishop to Lodge, June 20, 1923；兩信均在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3,” *Central Files*。

畢士博，指出他掌握了可靠的消息來源，顯示畢士博步履蹣跚地踏入以佛教藝術研究聞名歐美漢學界的愛麗絲・蓋堤 (Alice Getty) 於北京舉辦的晚宴。當時畢士博是否已喝得爛醉？畢士博是否已迷失在紙醉金迷的北京名流圈、忘了弗利爾藝術館與波士頓美術館託付的任務？羅紀要求畢士博就此提出解釋，且徹底改革與總部的聯繫方式：

> 我假定你留存的——日記、田野筆記或其他不管是什麼——比你寄給我的報告來說更為豐富、仔細。因此，我要你把紀錄謄本，以及必要的補充說明，作為例行公事一環，未來以不超過兩個月的間距，整本寄給我。[40]

收到羅紀的信後，畢士博慌忙回信，指出當天他正因工作壓力過大而「精神崩潰」。畢士博保證，他將會謹遵羅紀囑咐，從而避免此擾人之誤解再次發生。[41]

不過，就在羅紀發信質疑畢士博的自制能力、並要求改善與總部之間的溝通關係之際，畢士博抵華以來投注在與中國各考古機構協調的心力有了初步成果。一九二四年一月，在歷史博物館副館長裘善元（圖二）的居中斡旋下，教育部聘畢士博為歷史博物館的榮譽顧問（無給職）。裘善元向畢士博表示，「我們要挖哪就可以挖哪了」(Now we can dig anywhere)。[42] 隨後，在裘善元的陪同下，畢士博、文禮與董光忠前往河北、河南、陝西、山西等省調查。所到之處，畢士博一行人受到省級機構的禮遇，得以考察長安、秦始皇墓、漢武帝墓等遺址。五月間，裘善元詢問畢士博，據報有農民於河南信陽游河鎮掘出數座古墓，而歷史博物館已取得必要的發掘許可，畢士博願不願意以顧問的身分前往指導？畢士博欣然同意，認為這是個絕佳的機會向歷史博物館乃至於中國民眾展示什麼是「科學的考古發掘」。於是，在畢士博於發掘技術、地層鑑定、文物保存等面向的指導下，由歷史博物館組織的考古調查隊於游河鎮王坟洼與擂鼓等處開挖三處漢代古墓，出土「瓷洗、瓷壺、瓦瓿、瓦罌、人骨、柩釘、五銖錢、四乳鑑、鐵鐮、鐵斧、金環，又陶鼎、陶瓿、陶鐘、陶瓶、永元十一年墓磚等」。[43] 八月一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2 時至 5

---

[40] Lodge to Bishop, March 31, 1924,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4,” *Central Files.*

[41] Bishop to Lodge, March 19, 1924,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4,” *Central Files.*

[42] Bishop to Lodge, March 10, 1924,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4,” *Central Files.*

[43] 引文出自傅斯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十八年度報告〉，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 6 卷，頁 93。

時），在裘善元的安排下，歷史博物館展出游河鎮的發掘成果，以及畢士博所攝之現場照片，「共計二百二十三件」，吸引了五六千人前往參觀。[44] 教育部亦為此設宴致謝畢士博一行人。[45] 為何中國政府的態度有了如此轉變？畢士博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政府為了「回報」美國政府歸還庚子賠款的決定。在其致羅紀的信中，畢士博建議，史密森研究院應趁勝追擊，代表美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簽訂中美科學合作協定。[46]

然而，面對畢士博以顧問身分取得的成就，羅紀的態度有所保留。能與中國官方機構合作考古調查自然是件美事，他問道，但問題是要怎麼平分發掘所得？他要求畢士博儘速向歷史博物館等中國考古機構表態，強調史密森研究院派遣畢士博來華的目的並不僅是「協助」中方機構從事調查而已，同等重要的，是以平等、互惠的態度與中方機構合作考古調查，並以部分發掘所得作為回報。「要是中國人投桃報李，我相信你佐以手腕、直白與謙和的管理，如此最終將使一切臻於完滿」，羅紀寫道。[47]

三・「今日中國最佳的心靈」

當然，畢士博明白，其任務不僅是擔任中國考古機構的顧問——然在衡量當時中國文物界的氛圍後，畢士博認為，坦白告知北京學術社群其來華目的的時機，還未到來。畢士博的考量是，一九二四與二五年間，北京的社群開始懷疑「洋顧問」的真正意圖。從畢士博的通信來看，下列案例為引發類似懷疑的導火線。首先涉及外國考古團隊之規模的擴大與組織化。例如，一九二三年七月間，在與地質調查所達成合作協議後，安卓思 (Roy Chapman Andrews, 1884-1960) 即率領紐約自然史博物館的考察隊前往蒙古；雖說沒如預期地發掘到古人類的化石，安卓思的團隊發現前所未見、震驚國際的恐龍蛋化石。與之同時，東京帝國大學的原田淑人 (1885-1974) 與京都帝國大學的濱田耕作 (1881-1938) 則來到北京，與北京大學的馬衡與

[44] Bishop to Lodge, August 2, 1924,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4,” *Central Files.*

[45] Bishop to Lodge, July 29, 1924,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4,” *Central Files.*

[46] Bishop to Lodge, March 10, 1924,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4,” *Central Files.*

[47] Lodge to Bishop, March 31, 1924,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4,” *Central Files.*

沈兼士 (1887-1947) 討論如何系統地開挖中國境內的遺址。第二，同樣在一九二〇年代間，與中國學術界關係密切、長期滯華的美國藝術史學者福開森 (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向著名文物收集家與鑑賞家端方的遺族購得青銅器一組，隨即將之交由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典藏。[48] 第三則為與地質調查所關係密切的安特生 (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在一九二一年以仰韶村發掘將研究「擴展到史前考古學」後，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到一九二四年十月的十八個月間，安特生又於甘肅、青海一帶發現五十餘處考古遺址。[49] 對北京學術社群而言，儘管安特生對中國史前史的貢獻毋庸置疑，其不時將其採集的古物與化石寄回斯德哥爾摩（至 1925 年為止約有 3 萬件）的做法，還是啟人疑竇。特別是，一九二五年七月，安特生便返回斯德哥爾摩，於烏普薩拉大學與東方博物館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籌備處等機構擔任要職。對此，部分的北京學術社群不免振振有詞，到頭來這位瑞典學者關注的還是如何將中國的文物與標本運出中國，什麼「仔細研究後即會將一份歸還中國」，不過是托辭與修辭。[50] 第四為曾於一九一三年為弗利爾、沃卡特（史密森研究院秘書長）與威爾森（美國考古研究所所長）來華評估於北京設立「美國考古學院」之可能性的沃拿 (Langdon Warner, 1881-1955)。一九二二年，在前往敦煌調查途中，沃拿以文物保存的名義，以破壞手法取下大量壁畫，將之運回波士頓的佛格博物館 (Fogg Museum) 典藏。第五則是為費城美術館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採集中國文物的傑尼 (Horace Howard Furness Jayne, 1898-1975)。在其甘肅的調查途中，傑尼移除了雕刻上的泥與金箔，以便了解之前的雕像構造如何。[51] 最後便是畢士博自己。儘管畢士博自認為相當低調與謹慎，一

[48] Bishop to Lodge, July 29, 1924,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4," *Central Files.*

[49] 引文出自戴麗娟，〈中國地質學及史前學發展初期之國際性格〉，頁 148；關於安特生於仰韶發掘後的活動，見該文頁 148-150。從畢士博的通信來看，畢士博與安特生於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開始建立通信關係。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即安特生即將離開北京、回到斯德哥爾摩述職前夕，安特生更寫了封熱情洋溢的信件給畢士博，感謝畢士博慷慨地分享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也請畢士博在他返國後繼續這樣做。見 Johan Gunnar Andersson to Carl Whiting Bishop, June 27, 1925, Peking, Box 2, Folder 2,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50] 關於北京學術社群對安特生之態度轉變，見 Bishop to Lodge, March 18,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51] 從畢士博的通信來看，由於沃拿與傑尼常常一起行動，在北京學術社群眼中，兩人為犯下眾多文物破壞與盜取罪行的共犯；見 Bishop to Lodge, September 21, 1925, 19, Ta Yang I-pin Hutung,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une 1925-November 1925," *Central*

九二四年，當他以教育部顧問之姿協助歷史博物館於信陽開挖數座古墓時，諸如「弗利爾藝術館不過是另一個試圖盜走中國文物的團體」、「畢士博之流絕非受嚴謹訓練的考古學者」等傳言也開始喧囂塵上。

一九二四年十月，在獲得羅紀首肯後，畢士博返美過冬。[52] 翌年一月，甫回到紐約家中的畢士博向羅紀捎去一信，詳列是年擬於中國展開的考古計畫。除了於白馬寺、新鄭、彰德、北戴河等處開挖外，畢士博寫道，他希望羅紀能撥給更多的田野經費，讓他能設法在「現地」保存如雲岡石窟等岌岌可危的古蹟。若非如此，畢士博指出，他很難取得中國官方與學術社群的信任，遑論將文物運回藝術館展示與保存。進而，畢士博寫道，為了應付其手上迅速開展的業務，他希望羅紀能准許他於北京租間較大的房子，讓他能於北京建立具規模的圖書館、實驗室與暗房等。第三，在人員編制方面，除了文禮與董光忠外，畢士博直言他需要一位「專業的文書員」(professional bookkeeper) 以協助他處理記賬、報賬等繁瑣的業務，讓他能專心投入田野考古工作。

除了前述在計畫執行、研究設備、人員編制等面向的更動外，另一個讓畢士博念茲在茲的是如何讓其領導的考古團隊更具實力與競爭力。依畢士博所見，堪稱其抵華以來在考古探勘與調查等事物之左右手的董光忠與裘善元，儘管負責盡心，對於考古學於中國的發展懷有高度使命感，但不論在心態抑或實作上均難被稱為合格的考古學者。有鑒於此，畢士博計劃增聘一位目前在南開大學任教、甫自哈佛大學取得人類學博士學位的「李濟博士」。他致信羅紀，表示李濟「是個有些年輕的傢伙」，但他「同意丁（丁文江，筆者按）博士——他本身是個絕佳的裁判——他（李濟，筆者按）擁有今日中國最佳的心靈之一」。畢士博評論，李濟缺乏的是「更廣闊的經驗」(broader experience)，若弗利爾藝術館能協助李濟補強此部分，有

Files。值得注意的，在一封日期為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日的信件中，畢士博告訴羅紀，由於傑尼種種招人非議的舉動，他還是跟這位美國探險家保持距離為上。見 Bishop to Lodge, May 12, 1925,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anuary 1925-May 1925," *Central Files*。

[52] 在一封致羅紀的報告書中，畢士博回顧了他的行程：十月十六日畢士博離開北京前往漢口，再搭蒸汽船前往南京，緊接著搭火車前往上海，從那前往香港；十月二十七日，畢士博從香港換船前往加爾各答，由此取道歐洲返美，於新年夜抵達紐約。翌年一月二十七日，畢士博從紐約啟程，搭火車橫越美洲大陸，二月七日啟程前往上海；見 Bishop to Lodge, March 3, 1926, Peking, China,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朝一日李濟勢必成為中國考古學界的領導人物；弗利爾藝術館也將因此受益，在日後中國考古學界握有更多發言權。[53]

畢士博於一九二五年三月九日返回北京，隨即著手改善其考古團隊的體質。四月二十五日，他於北京東城的大羊宜賓胡同租了間房子作為總部（圖三）。[54] 在文書員的聘用上，畢士博則找到了加州阿拉梅達醫學圖書館的首席圖書館員 (Head Librarian of the Alameda County Medical Library) 福爾斯寇特 (Daisy Furscott, 1887-1966) 女士來擔任。[55] 畢士博當然也沒忘記，要讓其團隊在眾多外國競爭者的包夾中走出條自己的路，他必得招募「今日中國最佳的心靈」——李濟。三月二日，畢士博與李濟相遇於天津，在閒聊中，畢士博趁機詢問李濟加入其團隊的意願。十二日，畢士博向李濟捎去一信，正式提出邀請。畢士博強調李濟的加入不僅能促進考古學於中國的生根與發展，對中美政府與人民的相互理解更有推波助瀾之功。緊接著，畢士博表示，他已與上級就薪資交換意見，他可以保證史密森研究院絕對不會虧待李濟。此外，畢士博亦強調，若李濟願意，史密森研究院將會負責出版李濟的研究成果——考慮到史密森研究院的國際知名度，以及該院出版品的廣大流通度，這將會是如李濟的青壯學者夢寐以求的機會。最後，畢士博施出其殺手鐧：若李濟有意赴歐美等重要考古機構進修，他會向史密森研究院推薦，讓李濟得在進修過程中享有足夠的財政與行政支援。[56]

一個為期五年、最終將在中美考古學史上留下印記的合作關係就此展開。

四・「直道而行」

被丁文江與畢士博視為擁有「今日中國最佳的心靈之一」的李濟，其於哈佛受的專業訓練並非如畢士博以為的考古學，而是體質人類學。即便如此，正如李濟在一份簡歷中指出的，他學習體質人類學（李濟用的詞彙是「人種學」）的「志向」是「把中國人的腦袋量清楚，來與世界人類的腦袋比較一下，尋出他所屬的人種在

[53] Bishop to Lodge, January 7, 1925,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anuary 1925-May 1925,” *Central Files.*

[54] Bishop to Lodge, March 3, 1926, Peking, China,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55] Bishop to Lodge, May 21, 1927, S. S. “President Harrison,” at Sea,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56] Bishop to Li, March 12, 1925, Box 6, Folder 14,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天演路上的階級出來」。以此為基礎，李濟寫道，「他還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蹟，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來尋繹中國人的原始出來」。[57] 雖然哈佛並未給予這位中國留學生任何「刨墳掘墓」、「尋繹中國人的原始」的學術訓練，在哈佛就學的三年間 (1920-1923)，李濟「對 111 名中國人進行了測量和觀察」（主要是波士頓與劍橋的中國留學生與華僑），並在體質人類學家虎藤 (Earnest Albert Hooton, 1887-1954) 與文化人類學家狄克森 (Roland Dixon, 1875-1934) 的指導下，完成題為〈中國民族之形成：一個人類學的探索〉(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 Anthropological Inquiry) 的博士論文。然這些研究經驗是否有達到李濟的「尋出他所屬的人種在天演路上的階級出來」的自我期許？李濟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不在於他對體質人類學作為判定中國人種在「天演路上的階級」的學科產生懷疑，而是「中國人作為一個種族類別」的命題本身就有問題。正如李濟在一篇題為〈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的文章中所稱的：「我並不認為我的數據〔博士論文數據〕可以用來保證任何武斷的結論，但我認為它們確實地證實了現代中國人體徵的極端複雜性，而中國人一向被認為是一個純一的種族。」[58]

李濟於一九二三年取得博士學位，啟程返國，隨即受聘為南開大學的人類學教授。翌年春天，發生了李濟後來所稱的「與他一生有關的事」，讓他得以「第一次去做我的考古工作」。原來，被畢士博稱為堪與圖坦卡門比擬的新鄭考古發現傳至丁文江處後，丁文江鼓勵李濟前往考古。依據李濟日後的描述：

> 丁文江先生知道發現這一座古墓之後，便鼓勵我前往考古；同時還為我湊了兩百塊錢，又找了一個地質學家與我同行。我和那位地質學家一起到河南新鄭縣時，正好碰上土匪做亂，並且計劃攻城，當地的情形非常混亂。我們在靳雲鶚的幫助下，開始工作；一共工作了兩個星期，除了找到幾副人骨頭

[57] 李濟，〈自傳簡歷〉，張光直、李光謨，《李濟文集》第 5 卷，頁 412。該簡歷寫於一九二〇年代間，當李濟自麻州的克拉克大學畢業，準備前往哈佛就讀博士之際。值得指出的，依據李濟的說法，「他初來美國時[1918，筆者按]的時候，是想學純心理的，一九一九年在那一門混了一個 B.A.後就跑到社會學裡邊去了」。

[58] 李濟，〈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英文 1923；中譯文 1990），張光直、李光謨，《李濟文集》第 1 卷，頁 4。關於李濟所受之體質人類學訓練與後續影響，見王道還，〈史語所的體質人類學家——李濟、史祿國、吳定良、楊希枚、余錦泉〉，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 163-187。

> 外，沒有找到其他任何東西。雖然這樣，但仍然不虛此行。我們的工作不用說是失敗了，但是在失敗中，卻獲得了無數的寶貴經驗。更由這些無數的寶貴經驗中，我們可以深切地體會到丁先生對我們的一番苦心。丁文江先生是要我們從實際的工作中，去找真實的材料與經驗。[59]

即是在「第一次去做我的考古工作」的時點上，李濟結識了畢士博，且「常在一些公共場合及集會中見面」。日後，李濟回憶接到畢士博邀請函時的心情與回應：

>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畢士博先生的一封信；他邀請我參加他們的團體，與他們一起從事田野考古工作。當我讀完了畢士博的邀請信時，覺得這件事發生得很突然，於是便跑去與丁文江先生商量，問他可不可參加。我提出兩個問題向丁先生請教。第一個問題是，我雖然在美國五年，但是卻從來沒有與外國人共過事，我不知道與外國人共事究竟怎樣。第二個問題是，張伯苓先生對我很好，我是不是應該離開他並且放棄教書工作去做別的。當時，丁文江先生答覆我說，一個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如果有機會親自採集第一手的資料，切不可輕易放棄這種機會；教書這項工作早點晚點去做，是沒有太大關係的，至於與外國人怎樣共事，丁先生對我說，最要緊的是直道而行，自己覺得有什麼應該先說明的條件，儘量地預先說明。我回去之後，便根據丁先生的意見，給畢士博正式回了一封信。信中提出兩個條件：一個是在中國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須與中國的學術團體合作；一個是在中國掘出的古物，必須留在中國。當時，畢士博並沒有立即給我回答，差不多隔了兩個多月後，我才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說：「你的條件，我們知道了，我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那就是我們絕對不會讓一個愛國的人，做他所不願做的事。」這個答覆我很滿意，便辭去了南開的工作，加入了他們的行列。[60]

---

[59] 此訪談以〈我與中國考古工作〉為題於一九六一年出版於《新時代》雜誌之創刊號，後收入張光直、李光謨，《李濟文集》第 1 卷，頁 1-2。

[60] 李濟，〈我與中國考古工作〉，張光直、李光謨，《李濟文集》第 1 卷，頁 2-3。值得注意的，李濟這段文字出於日後的回憶，不免簡化了當時他與畢士博的互動關係。在其一九二六年出版的〈新鄭的骨〉一文中，李濟如此描述畢士博，甚至對畢士博「慷慨地將他的發現交給我處理」表達了謝意：

「雖說這次考察不太順心，但還是完成了一件工作。從隨同青銅製品一道出土而被工人當做棄物扔掉的東西中，我發現了一些骨。以下我將首先描述這些骨，然後將之與史密森研究院的畢士博 (C. W. Bishop) 先生發現的骨做個比較，最後再來討論一下這些發現的意義。畢士博先生有一段短時間曾目睹了這次發掘。但是他當時是在一個非常匆忙的旅途中，在挖出骨的當時他正要離開。他的時間僅夠取走一段下頜骨和幾塊人的和其他哺乳類

畢士博的邀約、李濟的回應與畢士博的回信目前仍存於史密森研究院檔案館。從這些信件來看，李濟的確沒有立即答應畢士博的邀約。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他致信畢士博：「對於未來的工作與更多關於這個計畫的合理性，我需要跟你多加討論細節，我理解這是一個可以實現我計畫的有利的機會；然而，我們在進入這個討論前，我應該讓這個計畫更為清晰。我相信這也是你所希望的。」李濟欲澄清之點便是弗利爾藝術館是否會將掘出之藝術品留在中國；若不能的話，他明確希望畢士博不要託付他執行此爭議的任務。[61]

然而，畢士博似乎沒有爽快地「接受」李濟的條件。首先，他指出「史密森研究院的座右銘是『知識的進步』」，而由他主持的考古計畫便是依此構思的：中國「過去的成就與未來的潛在影響力，在過去一年來已遭土匪、洪水、饑荒與內亂所掩埋。沒有國家在當前可以獨存；我想沒有什麼援助會比得上我為中國打上合適的光，尤其是在美國人民之前」。至於李濟關心的發掘所得是否會留在中國的問題，畢士博寫道，若李濟「決定接受這個我所關切的工作，我可以提供我最誠懇的保證，你將不會被指派去做那些有違中華民國忠誠度的任務」。[62]

我們將看到，畢士博模稜兩可的回答讓李濟陷入了兩難。一方面，若能得到史密森研究院的支援，「刨墳掘墓」的夢想似乎不再遙不可及；另方面，所謂「將不會被指派去做那些有違中華民國忠誠度的任務」是什麼意思？是指畢士博無論如何還是要設法把古物運出中國，只是他不會指派李濟去接此燙手山芋？若是如此，假設他為史密森研究院的正式成員，他有無可能逆勢而行，成為文物流失的一道防

動物的骨；而這些骨還是工人們遞給他的。他臨走時囑咐工人們要小心保管，並說他還要回來看這些骨。但是畢先生並沒有回來，工人們也因不知這些骨有何用途，自然就沒能遵守他的囑託。畢先生慷慨地將他的發現交給我處理。」

見李濟，〈新鄭的骨〉（英文 1926；中譯文 1994），張光直、李光謨，《李濟文集》第 1 卷，頁 25。

[61] Li to Bishop, March 16, 1925, Box 6, Folder 14*,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62] Bishop to Li, March 23, 1925, Box 6, Folder 14,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值得一提的，在後續致羅紀的信中，畢士博寫道，儘管李濟表達了掘出之文物能否留在中國的疑慮，他在某個程度上已讓李濟接受他的觀點，即為了「知識的進步」，古物還是得運往國際知名的機構典藏與研究。畢士博告訴羅紀，李濟甚至還說，既然在很多國家已有類似的先例，他（李濟）並不認為將古物運出中國至弗利爾藝術館典藏，會導致什麼問題——特別考慮到在中國「有前例」這檔事是多麼的重要。Bishop to Lodge, May 12, 1925,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anuary 1925-May 1925," *Central Files*。

線？對此些問題，李濟採取了務實的策略，即在加入畢士博團隊後，逐步擴張影響力，讓他不只是畢士博的助手或棋子，而是可與畢士博平起平坐的合作對象。

李濟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起正式成為史密森研究院之中國考古團隊的一員，月薪三百圓（墨西哥銀圓；以下同）。為了能專心「與外國人共事」，李濟還辭去了在南開的教職，改以兼任教授的身分於甫成立的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以下簡稱清華國學院）教授考古學（月薪 300 圓）。[63] 在一封致羅紀的信中，畢士博描述了李濟是如何投入他的新工作：

> 李博士想把他的講座訂在冬學期，談些與我們的工作直接相關的科目，因為你知道那時無法做中國北方的田野工作，這樣李博士就不會影響他的田野工作。他可以得天獨厚的優勢，準備他自己的特殊任務。他可作為我們與中國最有企圖心且最進步的學院之一間的中介。[64]

有李濟這樣的「中介者」，畢士博相信他可以避免重蹈福開森、沃拿、傑尼等人的覆轍。值得指出的，畢士博並不認為這些引起北京學術社群反彈的美國探險家與採集者做錯了什麼事——關鍵是他們「無法抓住和中國人一起工作的首要要領；借用商業片語來說，也因為他們沒耐心去『得到結果』或是『露個面』」。就以傑尼為例，畢士博評論道，這位以研究中國文化為職志與職業的學者顯然對於現實中的中國沒什麼興趣。「在北京的時候」，畢士博寫道，傑尼「對中國人呈現一種冷酷的態度，表示就算要瓜分這個國家也沒什麼顧忌」。[65]

不同於畢士博一九二三年初訪北京時目睹的北京學術社群，位於北京的眾多研究機構已不再是不相從屬又各自為政，而是多少發展出橫向的非正式連結，構成如安特生所稱的「一個科學研究的新世界中心」(Peking, a new world centre of scientific research)。[66] 在致羅紀的信中，畢士博指出，「歷史、考古學與古代書籍的考證之學」為撐起此「新世界中心」的三大支柱，而在安特生離華之後，他已被視為是常駐中國、首屈一指的外國考古學者與中國史前文化的專家。關鍵指標在

---

[63] Bishop to Lodge, April 1, 1925,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anuary 1925-May 1925,” *Central Files.*

[64] Bishop to Lodge, June 28, 1925,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une 1925-November 1925,” *Central Files.*

[65] Bishop to Lodge, September 21, 1925, 19, Ta Yang I-pin Hutung,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une 1925-November 1925,” *Central Files.*

[66] 該詞出現在一封安特生致畢士博的信件中，見 Andersson to Bishop, June 27, 1925, Peking, Box 2, Folder 2,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於，畢士博寫道，他已獲邀擔任《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Review*) 之考古學部門的特約主編，而他希望能以此為平臺，「教育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67]

隨著其在北京學術社群之地位的提升，畢士博對李濟的依賴也日益加深。在畢士博致李濟的通信中，畢士博或則要求李濟整理中文典籍，做成英文摘要；或則期待李濟能透露中國學術社群的內部訊息。例如，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四日，畢士博致信李濟，希望李濟能告知由中國學者與學術單位主持的考古發掘。他需要這樣的訊息，畢士博寫道，因為他已應允《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的主編刁敏謙，儘速完成關於中國考古學之進展的文章，發表在該期刊上。此外，畢士博寫道，他收到美國地理學會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的邀約，希望他能撰寫中國海外擴張的早期歷史。儘管他已從法國漢學家沙畹 (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翻譯的《史記》中得知，畢士博寫道，司馬遷曾提及秦始皇於東海求長生不老藥的故事——但如《山海經》這樣的「奇幻文學」能否提供一些另類的線索？[68]

即便如此，從畢士博與李濟的早期通信來看，畢士博並未認真地看待李濟作為考古學者的潛能——而僅視之為深諳中文與英文的中介、翻譯或敲門磚而已。要理解李濟之所以能在史密森研究院的充分支持下、於一九二六年主持夏縣的考古發掘，我們得審視堪稱畢士博以史密森研究院之考古團隊負責人之身分抵華後的最大挫敗：大同方山的考古發掘。

五・「精神病患的拘束衣」

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旦畢士博逐漸掌握北京學術社群的運作概況，且其在北京東城大羊宜賓胡同十九號之總部的運作漸上軌道後，畢士博便試著重啟田野考古工作。在與董光忠與裘善元商討後，畢士博選定了大同方山（圖四）。畢士博告訴羅紀，這並不是個適合田野考古的時點，因為「這個國家的整體狀況比一九一一年後的任何時點都還要來得糟」。「社會與政治的組織正一點一滴地解體與崩解」，畢士博寫道，再加上「匪徒四起、反覆農作欠收、對未來之不確定」等因素，系統地

[67] Bishop to Lodge, September 21, 1925, 19, Ta Yang I-pin Hutung,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une 1925-November 1925," *Central Files.*

[68] Bishop to Li, November 4, 1925, 19, Ta Yang I-Pin Hutung, Box 6, Folder 14,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考古發掘不啻是天方夜譚。例如，畢士博告訴羅紀，北京大學曾派遣一支考察隊前往洛陽「探勘周朝的舊都」——不料，該「舊都」已淪為「土匪」的巢窟，該考察最後以失敗告終。[69]

雖說如此，畢士博告訴羅紀，面對北京學術界與文物界對諸如此類「以科學考察為名，行掠奪之實」的不快，他已經構思出解套之道，也就是方山發掘如果順利的話，他已經知道要如何在北京學術社群的虎視眈眈下將古物運回藝術館。他認為，關鍵在於善用史密森研究院的官方立場，即他於中國取得（不論是透過購買還是發掘）的古物均屬美國政府財產——依據國際慣例，當他把這樣的「美國財產」運出中國時，中國海關既無權開箱查驗，也無權徵收關稅。在一封日期為六月二十八日的信件中，畢士博向羅紀表示，儘管曠日費時，他「已成功安排此事」。[70] 但畢士博要羅紀有耐心些，因為他正準備於山西大同展開發掘工作，「要是運送任何文物出境，恐怕會毀了一切」。[71]

由於向內政部申請發掘許可已無可能（可能也不管用），畢士博便透過大同的行政長官，向山西省長閻錫山提出發掘申請。九月四日當天，畢士博接到邀請，希望畢士博能撥冗參加晚宴。在致羅紀的信件中，畢士博寫道，儘管他對山西菜不敢恭維，他們還是勉強赴約——結果，在「半打的地方賢達」面前，「我們主人端出的第一道菜是宣布省長閻錫山給了我們繼續前進的許可證」。[72]

九月二十二日，在回北京備妥裝備與物資後，畢士博、裘善元與董光忠一行人便前往山西大同，準備從事一九二四年游河鎮發掘以降的首次考古發掘。畢士博一行人於十月二十日前後抵達方山，下榻一處寺廟。他們隨即有了第一批訪客：滿懷憂慮與敵意的村落代表。代表向畢士博表示，村民深怕畢士博的發掘工作會壞了他們的風水，日前全鄉的十八個村落已經組團前往大同抗議。代表指出，方山高原是塊有力的風水寶地，像個「有腳有爪的龍」，若畢士博的發掘壞了當地的風水，不僅方山——甚至整個大同——都會因此遭殃。有鑒於此，代表指出，大同的行政長

[69] Bishop to Lodge, September 21, 1925, 19, Ta Yang I-pin Hutung,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une 1925-November 1925," *Central Files.*

[70] Bishop to Lodge, June 28, 1925,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une 1925-November 1925," *Central Files.*

[71] Bishop to Lodge, September 21, 1925, 19, Ta Yang I-pin Hutung,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une 1925-November 1925," *Central Files.*

[72] 見 Bishop to Lodge, October 16, 1925,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une 1925-November 1925," *Central Files.*

官已要他們轉告畢士博，希望畢士博將開挖的時點延至春天，並利用此空檔與村民好好溝通。畢士博不從。他向代表表示，他保證他不會開挖村內的大型古墓，代表們可否與村民溝通，「讓他們得以探探村中的一些次要遺址」。是夜，代表再度來訪，還帶了鄉長。一陣長談後，他們承諾在早上回來，看可與村民達成何種協議。[73]

隔天（10 月 21 日），代表和鄉長果然現身，表示村民還是不同意畢士博開挖方山高原——若畢士博執意孤行，後果將不堪設想。即便如此，由於僱用的工人已然在廟前集結，畢士博還是決定一試。不過，當一行人剛離開寺廟，寺廟裡的鐘聲開始轟然作響，且山谷另一端的鐘也發出「狂野的警響」。緊接著，讓畢士博驚異的，大批農民攜著農具，沿著「崎嶇的山丘」朝著他們「狂奔而來」。在強自鎮定、勉力推進一會後，畢士博發現，方山發掘不是可不可行的問題，而是生死交關之事。畢士博的失望難以言喻。在致羅紀的信中，畢士博表示，「我們在山西的工作突然、全沒料到的結局純粹的厭惡」。[74] 原來，畢士博表示，來自省長的許可證是不夠的——他們會需要四張：「一張來自中央政府，一張來自省當局，一張來自地方行政人員，還有最後一張來自當地民眾。關於這些，只有最後兩者比較有正面幫助，但無法確保四張中的任何一張，就足以讓你的工作一起跟著停擺。」[75]「要在中國達成更多這類事務，都像穿上精神病患的拘束衣一樣」，畢士博告訴羅紀。[76]

失望之餘，畢士博怪罪董光忠與裘善元的工作能力。在致羅紀的數份信件中，畢士博抱怨兩人的語言能力（畢士博稱董光忠再兩年「就會全部忘記英文要怎樣講了」；稱裘善元「沒留過學，幾年前還不通英文」）、遭到中國高昂的民族主義情緒荼毒（「我不認為在他現在這種思維架構下，他有可能為我們盡他之力」）、不敢跨出舒適圈（「我認為他太習慣北京，以致無法想像身在他方。他在這裡的人生太長、太安適、太守宗法了，置身他覺得應該——且須永遠如此——的老婆懷

[73] Bishop to Lodge, January 8, 1926, 19, Ta Yang I-pin Hutung,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74] Bishop to Lodge, January 8, 1926, 19, Ta Yang I-pin Hutung,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75] Bishop to Lodge, October 16, 1925,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une 1925-November 1925," *Central Files.*

[76] Bishop to Lodge, August 13,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中」）、傾向放大阻礙（「地質調查所的人告訴我就算有土匪或肆無忌憚的部隊騷擾，他們的野外人員一直規律地來來去去」）、過於躁進（「我都快被說服我們全部的工作整體太過『謹慎行事』」）、過於謹慎（「但這裡冬天已經過了一半，但依我所見，董先生和裘先生都還沒達成任何天殺之事，為明年春天的作業做出準備」）。[77] 雪上加霜的是，畢士博告訴羅紀，儘管已共事良久，裘善元與董光忠兩人似乎沒從他身上習得任何考古學知識與應有態度。畢士博抱怨，裘善元「除了靠自己之力興建之北京博物館，沒看過其他博物館」，「目前為止他所做的都是基於他的常識、閱讀與道聽途說」。董光忠的狀況則更糟。畢士博告訴羅紀，「自信是項燦爛的特質」，但董光忠似乎認為，「他在大學博物館當門房的這幾年，已經讓他變成徹底的科學家了」。[78]

關於史密森研究院於北京與國際學術社群中的地位與處境，畢士博感到格外憂慮——特別是，在安卓思的運籌帷幄下，自然史博物館於中亞的古生物學與史前考古考察似乎異常順遂。[79] 的確，考慮到其在一九二三年離美時羅紀的指令，即畢士博得在兩年間內與中國學術團體合作開挖考古遺址，平分所得，且花費得控制在六萬美金以內，畢士博至今的表現乏善可陳。[80] 在「在一九二六年無論如何得做出些成績」的壓力下，畢士博的希望全寄託在李濟身上。就畢士博而言，李濟已不僅是讓他得以打入北京學術社群的敲門磚，而是其領導的考古考察能否迴光返照、甚至後來居上的試金石。於是，在方山發掘鎩羽而歸後，畢士博便組織一系列的「周一午餐會」，邀請「有地位的朋友」，如北京協和醫院解剖部門的體質人類學者史蒂文森（Paul H. Stevenson, 1890-1971；「曾在閻錫山的合意批准與協助下遍遊山西西部」）、治外法權委員會的耶卡布斯 (J. E. Jacobs) 等人與李濟座談。即在如此的腦力激盪中，李濟逐步形成以汾河流域為中心的田野考古構想。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的午餐會中，李濟向畢士博表示，他覺得前往汾河探勘的時機已然成

[77] 畢士博主要在下列兩封信件中傾瀉出他對董光忠與裘善元的不滿：Bishop to Lodge, October 16, 1925,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une 1925-November 1925," *Central Files* 以及 Bishop to Lodge, January 8, 1926, 19, Ta Yang I-pin Hutung,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78] Bishop to Lodge, January 8, 1926, 19, Ta Yang I-pin Hutung,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79] Bishop to Lodge, May 6,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80] Lodge to Bishop, August 24, 1923,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3," *Central Files.*

熟——只是他「無法確保往石家莊的交通順暢，特別是因為國民軍之前才對山西進行無端的攻擊，導致隨後的反擊，現正把持住那個關口，也正憤恨著他們的失敗，將各種障礙放在往太原之旅人的路途上，而北京—漢口鐵路上的火車又少得可憐，訂票全得受託才有」。不僅如此，李濟表示，「就算是事先買了票的人也可能發現火車上塞滿了軍人，還拒絕讓他們上車」。隨後，李濟告知畢士博，「從石家莊借道是已不抱持希望」——「唯一的機會是先至大同府，然後再到太原，有可能的話是用大客車，不然就是中國式的拉車」。在了解李濟的計畫後，畢士博便聯絡耶卡布斯，因為治外法權委員會預計前往太原考察監獄系統，耶卡布斯與其團隊會有班特別列車，而李濟似乎可搭順風車前往太原。不過軍方拒絕讓該團隊通行，結果無疾而終。一直到二月一日的午餐會，北京至太原的交通問題才得到初步解決。李濟告訴畢士博，他有位與軍方關係良好的親戚，正準備搭一班「特殊列車」前往石家莊，他準備一同前往。[81]

除了交通外，李濟也自行打點了其餘田野考古得以展開的諸多要件。如其日後的田野報告中指出的：

> 清華學校校長曹雲祥欣然同意給予合作，他以校長的名義給閻錫山寫了一封信，商妥同意我去山西南部旅行。恰巧中國地質調查所正要派袁復禮先生到同一地區進行地質學的田野調查工作。袁先生是一位富有經驗的地質學家，他曾經和安特生一道在甘肅考察了兩年，對史前考古學極感興趣。這樣我們就決定結伴同行。[82]

對於李濟一手主導之田野考古，畢士博樂觀其成，且給予全力支持。除了負擔李濟的薪資與田野開銷外，他也向李濟表示，他會負擔袁復禮的田野開銷（袁復禮的薪資係由地質調查所支付），以及提供兩位所需的田野設備。[83]「如果他〔李濟〕成功在這個省為我們開發一片豐富的考古田野，我們過去全部的失意就可望獲得巨大的補償」，畢士博告訴羅紀。[84]

---

[81] Bishop to Lodge, March 19, 1926,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82] 李濟，〈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調查〉（英文 1927；中譯文 1983），張光直、李光謨，《李濟文集》第 2 卷，頁 158。

[83] Bishop to Lodge, August 13,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84] Bishop to Lodge, March 19, 1926,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六・「中國的美索不達米亞」

一九二六年二月，人在山西太原的李濟捎了封信給畢士博，指出他已與省長秘書會面。那時首長「正忙著一個重要會議」，李濟說，而秘書告知省長已經下達汾河谷地一帶的行政機關，要他們全力配合李濟與袁復禮的探勘工作。「這當然是較為一般性的許可證」，李濟寫道，「但這也是我們現在全部所需的了」。[85]

李濟與袁復禮隨即租了一臺推車 (cart)，以及騾、馬與驢各一匹，於二月九日啟程。三天後，他們抵達介休縣。在二月十九日的信件中，李濟向畢士博報告進度。光是第一天他們就趕了三十哩路，李濟自豪寫道，第二天則趕了四十哩路，第三天便抵達介休縣。李濟寫道，由於介休縣長官為他的遠房親戚，他們受到熱情的接待，也獲得長官的保證，將會全力協助兩人於汾河谷地的探勘——但他們絕對不可冒犯墳墓或寺廟。雖然如此，時值新年前夕，他們無法做些什麼，只能在介休縣周遭做些探查。就李濟而言，能在史密森研究院充裕的資金支助下，「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蹟」以「尋繹中國人的原始出來」，讓他眼界大開。在致畢士博的信件中，李濟鉅細靡遺地描述行程、旅途所見、特殊人文與自然景觀（如允為太原以南之建築特色的「窑房」、綿山的佛教寺廟中供奉的男性觀音等；李濟唯一的抱怨是沿途飛揚的黃土讓他們在「打尖」之際幾無食慾）。此外，李濟也告訴畢士博，他抽空為當地人做了簡要的體質測量。「這裡的人們為相當異質的群體」(the people here seems to be quite a heterogeneous group)，李濟寫道，「我已看到可與一般美國人比擬的鬍鬚男，我也看到有著百分百黃色之髭的男人」(I have seen bearded man who can be compared with an average American; I have also seen man with hundred percent yellow moustache)。[86]

三月七日，李濟於山西翼城捎了封短簡給畢士博，指出他們正取得良好的進展，也已經遇到幾個非常具有潛力的歷史與史前遺址。李濟估計再三週即可完成初步的調查。接著他們會回北京與畢士博面談。[87]

---

[85] Bishop to Lodge, March 12, 1926,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86] Li to Bishop, February 19, 1926, Chieh-hsiu Hsien Shansi,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87] Li to Bishop, March 7, 1926, I-Cheng Hsien, Shansi,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什麼是李濟所說的「非常具有潛力的歷史與史前遺址」？在李濟日後交給畢士博的報告中，他寫道，兩人於二月二十一日離開運城，翌日便抵達「傳說中的夏朝王都」——夏縣。兩人花了大量時間探訪「禹王後裔和許多著名大臣的陵墓」，但他「根本無法肯定這些是或者不是真正的陵墓」——因為「看起來都像是普通的墳塚，只是稍大一些」。但就在「尋訪這些陵墓的途中」，李濟寫道「出現了意想不到的事」：

> 當我們穿過西陰村後，突然間一大塊到處都是史前陶片的場所出現在眼前。第一個看到它的是袁先生。這個遺址佔了好幾畝地，比我們在交頭河發現的遺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當我們隨意撿拾一些暴露在地表的碎陶片時，聚攏了不少村民。我們沒能在這裡逗留多久，以免引起過多的注意。[88]

李濟與袁復禮於四月六日間返回太原，十五日抵達北京。不過，就當畢士博準備與李濟面談時，李濟卻因高燒病倒。[89]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當李濟逐漸在「傷寒與肺炎摧殘下康復」，他隨即在醫院中寫了封信給畢士博，表示他已經迫不及待想回到山西，開挖某些深具學術價值的考古遺址。為了達到此目的，李濟寫道，他想安排畢士博與清華學校的校長曹雲祥會面，為未來可能的合作交換意見。[90]

原來，北京之學術社群於古生物學、史前考古學、地質學等領域取得的學術成就，乃至於其在山西汾河流域的初步探勘，均讓李濟深感鼓舞。他開始思索，如果說中美庚款委員會可慷慨提供經費，協助中國成立清華學校，有無可能透過英國公使館向中英庚款委員會申請經費，讓在古生物學、史前考古學、歷史考古學、人類學等領域展露頭角的北京學術社群，擁有「一所中國人類學與考古學的博物館」(a museum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在如此考量下，李濟起草了一份請願書（下列連署人的學歷與經歷均為請願書上所列者），邀請曹雲祥（哈佛大學博士；時為清華學校校長）、周詒春（耶魯大學碩士、上海聖約翰大學榮譽博士；清華學校前校長，時任財政調整委員會的秘書長[Secretary-General, Commission for the Adjustment of Finance]；中孚銀行經營者）、沈兼士（北京大

[88] 李濟，〈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調查〉，張光直、李光謨，《李濟文集》第 2 卷，頁 162-163。

[89] 畢士博告訴羅紀，李濟「狀況頗糟，高燒將屆四十度，已經認不得我了」。Bishop to Lodge, May 6,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90] Li to Bishop, May 26, 1926, P.U.M.C. Hospital,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學國學研究所所長）、翁文灝（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時為地質調查所所長、中國地質學會會長以及北京博物學會會長）、蔣夢麟（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北京大學的代理校長[Acting Chancellor]）、顏惠慶（法學博士；外交總長；財政調整委員會主席）、袁復禮（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時任地質調查所與北京大學生理學講師）、布達生（Davidson Black；時為北京協和醫院解剖部門教授）、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哈佛大學博士；時任中國地質調查所的首席古生物學者、北京大學古生物學教授與北京博物學研究室的主持人）等代表人物參與聯署。

李濟首先以下列段落鋪陳「中國人類學」的重要性：

> 如許多訪問的人類學者可證實的，中國人的聚集係由許多不同的種族元素與血緣所組成；即便就專業的人類學家來說，這些元素與血緣的區分也往往是個謎。如此種族的混合必然對中國人作為一個種族的歷史與發展產生顯著影響。相較於歐美晚近的研究進展，甚至是亞洲的其他部分，於中國搜集到的人類學資料不僅稀少且零星。考慮到中國廣闊的幅員，系統且合作的人類學研究——若可被達成的話——將會獲得極具價值的成果。[91]

至於在「中國考古學」的部分，李濟強調其「亟須發展的程度」也不遑多讓。關鍵在於，李濟寫道，「大部分的中國考古遺址已遭到無恥、肆無忌憚的古董販子秘密地劫掠」，而「他們不正當的採集方法已導致任何關於物件之地點、位置以及物與物之間的聯繫的知識，無法讓公眾得知，也妨礙了進一步系統的發掘」。李濟寫道，只有「以發掘為目的的科學考察」方能阻止如此肆無忌憚的、對遺址與文物的破壞，而其獲致的結果，不僅能取信大眾遺址與文物的科學價值，以及保存的必要性，且能為考古學知識的進展有所貢獻。

緊接著，李濟強調，即便北京內已有若干考古學或人類學的研究機構，這些機構卻因欠缺經費或科研人員不足等因素，無法勝任嚴肅的研究工作。例如，李濟指出，教育部所轄之歷史博物館至今僅做過兩次發掘，且還是在「史密森研究院之代表」的協助下方有所成；而內政部下的藝術博物館則只負責展示，在科研方面毫無進展。所幸，李濟認為，散布於各機構的研究人員已各自做出不錯的成績，如安特生與地質調查所就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探究、北京協和醫院的布達生與史蒂文森的體質人類學測量，以及他自己於湖北、湖南與山西的體質測量等。為了避免工作

[91] Tsing Hua College to The British China Indemnity Delegation, June 5, 1926, Peking,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重複，且讓散布於各研究機構的研究者得以集體之力、開創研究新局，李濟主張，於北京設立一個「設備良好」、「現代」的博物館實有必要。

就李濟而言，這所「現代」的「中國人類學與考古學的博物館」應該要座落於北京，且為「國立機構」(national institution)；它應該作為所有於中國完成之考古與人類學工作的「資訊交換所」(clearing house)；它應該要有獨立的行政組織。在奠定如此的基礎後，李濟期待，它應該要盡可能的擴充其規模，務求貫徹田野探勘、實驗室研究、出版與展示等四大功能。此外，李濟也強調，這間位於北京的國立博物館不僅是個博物館，它還必須發揮中央集權化 (centralizing) 的作用，即將如多頭馬車般的科研機構，以及欠缺橫向協調之科研活動，由上而下地統合。那麼，中英庚款委員會要出多少錢才能讓這間博物館成真？李濟列出張預算表，包括年度開銷與建設博物館的初始經費兩項。李濟估算前者（包括田野探勘、實驗室工作、展示、行政、建築物之維護等次項）約需九萬圓，後者（包括土地、建設、內部裝潢、傢俱等次項）則需六十五萬圓才算足夠。[92]

目前可及的史料無法確認中英庚款委員會的回覆——然這份由李濟構思、主筆與領銜的請願書顯示其於北京學術社群的影響力。畢士博對此樂觀其成。實際上，在與李濟與清華學校校長曹雲祥面談之後，畢士博已經準備疏遠其長期的盟友：歷史博物館。畢士博告訴羅紀，「和我們努力一起工作的歷史博物館隸屬教育部，為最受輕視、最窮，或是我得說幾乎沒能從政府的任何部門拿到經費的單位」，「他們的主管老是被授命的政客、有更好的缺就要跳槽，金援總是匱乏」。[93] 不過，畢士博認為，更糟的是那些在歷史博物館中工作的研究人員。「即使有意願與熱誠想要幫忙，與對科學一無所知的人合作，也是無濟於事」，畢士博評論。「他們對於考古發掘技術之意見與想法，十之八九都是垃圾」。[94]

與之對照，畢士博認為，哈佛大學博士與清華講師李濟才是夠資格與史密森研究院匹配的盟友。他告訴羅紀，「和清華合作可期望更好更快的結果」，「因為它的領導者不是個缺工作的政客或軍事家，而是一位留洋訓練過，具備外事經驗，或者我該說是有名望的教育家與外交家，他總是待我們相當友善。其資金相當充沛也

[92] Tsing Hua College to The British China Indemnity Delegation, June 5, 1926, Peking,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93] Bishop to Lodge, June 21, 1926, Hankow,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94] Bishop to Lodge, August 13,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穩定，是由我們政府那得來的部分庚子賠款」。[95] 至於李濟，在看到李濟完成的汾河流域探勘報告後，畢士博相信，如果在中國，他要找到能全心認同、且願意實踐史密森研究院之「知識進步」座右銘的學者，那人必是李濟：

> 我會說他是我所知的少數中國人中會願意「丟臉」的人，他要是有錯誤就會坦白承認。你看他的報告就會注意到一些例子。我認為，他的報告清楚反映他智識上的誠實。一有新的證據出現，他隨時就修正，甚至是丟掉他之前的想法，而他熱切追求知識是為了知識本身。[96]

畢士博、李濟與清華學校之合作所催生的果實便是李濟所稱的「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西陰村發掘。按照李濟日後交給畢士博的報告書，該合作是按照下列條件進行的：

> 當我覺得可以再出門的時候，我即與畢士博商量這件事。他代表弗利爾藝術館同清華學校校長曹慶五先生商量了幾條合作的條件，其中最要緊的是：
>
> 1. 考古團由清華國學院組織；
> 2. 考古團的經費大部分由弗利爾藝術館負擔；
> 3. 報告用中文英文兩份：英文歸弗利爾藝術館出版，中文歸清華國學院出版；
> 4. 所得古物歸中國各處地方博物館；或暫存清華國學院，俟中國國立博物館成立後歸國立博物館永久保存。

「此外」，李濟寫道，「清華國學院又答應負擔袁復禮先生工作時的薪金；其餘的用款都是由弗利爾藝術館捐助」。[97]

儘管與清華的條件並未如羅紀期待的平分發掘所得，但畢士博認為，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所在意的，毋寧是西陰村發掘的成型／成行顯示北京學術社群已被「培育」到一定程度，足以接受這樣一個純科學、與經濟無涉的研究活動。如他告訴羅紀的：

---

[95] Bishop to Lodge, June 21, 1926, Hankow,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96] Bishop to Lodge, August 13,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97] 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收入張光直、李光謨，《李濟文集》第 2 卷），頁 169。在一封致羅紀的信中，畢士博說明了與地質調查所間的合作方式：「除了出借給我們他們最好的田調人員以外，他們還好心借給我們相當完整的調查工具組。我們提供相當充足的相機電池，一個很好的溫壓計，還有一些小配件。」Bishop to Lodge, August 13,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 這個計畫會專注在一小區域，據知產量相當豐富，而且做得非常徹底，沒有之前我們一直慣用的「蜻蜓點水式」的戰略。從很多面向來看，我們現在的事業代表了我之前心中的目標，三年半前，我試著透過我們的大使薛曼博士熱誠的協助，要組織一個考古研究協會，困難之處首先在於，具足夠影響力的人，沒有被教養至可理解這類工作目的。再者，我們試著要涵蓋太多地方，但結果又是執行時有衝突、遭嫉及阻撓。現在，這事業恰僅屬藝術館與清華之間，地質調查所又有誠意批准與主動支持。就連現在的政治與社會動盪也對我們有利，因為，這讓其他人有機會可想想，除了阻撓我們工作以外之事了。[98]

畢士博毫不懷疑李濟對田野工作的熱衷及對弗利爾藝術館的忠誠。具體表現為，他告訴羅紀，「就在他出發前不久，李博士收到一份正式邀約，要去日本參與泛太平洋會議之官方代表團，對中國人來說，這般殊榮相當罕見。不過，就我所知，他沒一丁點後悔，就回絕此邀請，然後按照原來計畫出發」。[99]

七・「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

李濟一行人[100] 於九月二十六日離開北京前往太原。二十八日，在抵達太原後，李濟與袁復禮密集地拜會地方首長，說明清華國學院與史密森研究院將合作開挖西陰村遺址。由於安特生將三萬餘件古物與標本帶回斯德哥爾摩的爭議，兩人花了一些時間解釋他們不是為瑞典人工作，即發掘所得不會被帶至斯德哥爾摩。[101]

---

[98] Bishop to Lodge, August 13,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99] Bishop to Lodge, August 13,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100] 除了袁復禮外，李濟以史密森研究院提供的經費僱用了一名僕役。該名僕役原本是為李濟父親拉人力車的車夫，但由於讀寫能力都相當不錯，李濟便將之納為西陰村考古團隊的一員。見 Li to Bishop, October 1, 1926, Cheng-t’ai Hotel, T’ai-yüan-fu, Shansi,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101] 李濟在信中向畢士博告知此事；而在給羅紀的信中，畢士博給了更清楚的說明：「而且就我所知，瑞典皇太子即將造訪山西，已經引起官方懷疑，我們的事業是不是某種程度上與此事有關，我們的目的是否是要挖出埋藏地底的財寶，然後帶去斯德哥爾摩。在內地不太好解釋外國人間有什麼不同。不只是歐洲人、美國人甚至還有從他省來的中國人，在這裡通通被叫同一個名字，都叫『外國人』。」Bishop to Lodge, December 27,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十月一日，李濟一行人離開太原，十天後抵達尉郭鎮（位於聞喜縣與夏縣之間；西陰村位於尉郭鎮北方 5 里處）。兩人花了兩天的時間（10 月 10 日至 12 日）拜會地方長官。除了取得給地方頭人的正式通知外，李濟也取得了介紹信。抵達西陰村後，他們即「相當舒適地駐紮在西陰村長的辦公室中」。「到目前它是個平順的航行」，李濟寫道，「我也感覺不到未來會有什麼風暴」，「我希望，如果每件事都沒出差錯的話，幾天後我們應該可以動手發掘」。[102]

十月十一日，即李濟在尉郭鎮忙著與官員打交道的時刻，畢士博、董光忠與董光廉也前往上海，準備與李濟一行人在西陰村會合。為什麼要相隔約兩週（9 月 26 日至 10 月 11 日）再赴西陰村、而不是與李濟同行？在致羅紀的信中，畢士博解釋道，他原本的計畫要與董光忠前往宜昌，「開挖他親戚土地上的大型古墓」；然而，「新的獨裁者蔣介石領軍」的「廣東勢力」拿下漢陽與漢口，之後包圍武昌。受此影響，往南的火車隨即停駛。「我們的宜昌計畫只得暫且擱置」。於是，畢士博告訴羅紀，他決定「緊跟著李博士的腳步」。[103] 日後，當西陰村發掘被證明是個成功的嘗試，且李濟也開始在北京學術社群與報告書中表示，該發掘為首次由中國人領導的田野考古事業，畢士博告知羅紀：

> 不消說，如果我們不只是要做這一季的工作、而是幫未來更長遠的探勘鋪路的話，去年秋天我們在山西北部的慘敗，即讓我注意到必須十分小心、圓融且有手腕。這也是我先派遣李博士與袁先生去的原因。我們陣營得盡可能有純粹中國人的色彩，然後配上外國人指導員，實際上我的位子是考古學名譽顧問，即可資確認。因為，現今對所有在華外國人事業之一貫態度，我長久以來就理解到，我們如果不是與中國人、或是透過他們來做事，是做不成事的。[104]

另一驅使畢士博跟隨李濟腳步的因素是即將於是年 (1926) 十月到訪的瑞典王儲阿道爾夫 (Gustaf Adolf, 1882-1973)。[105] 畢士博告訴羅紀，「他對我們這裡的工

---

[102] Li to Bishop, October 1, 1926, Cheng-t'ai Hotel, T'ai-yüan-fu, Shansi,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103] Bishop to Lodge, August 13,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104] Bishop to Lodge, December 27,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105] 關於阿道爾夫的到訪，乃至於該到訪在中國與瑞典考古學史上的意義，見戴麗娟，〈中國地質學及史前學發展初期之國際性格〉，頁 143-147；Perry Johansson, *Saluting the Yellow Emperor: A Case of Swedish Sonograph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2), pp. 101-103。

作興趣很濃，特別是自從新鄭縣發現那時開始，也表示想跟我聊聊一些有關中國歷史的考古學問題」。[106] 事實上，為了迎接阿道爾夫，北京學術社群預計在十月二十二日舉辦盛大的歡迎會，而籌備委員會已邀請畢士博於歡迎會上「朗讀一篇主要論文」：「委員會的意思是，德日進神父論鄂爾多斯的舊石器文化做頭一篇，然後是你所知的，王儲同胞安特生論新石器與銅器時代，再來就是我論早期歷史時代。」[107] 即便這邀請是個殊榮，畢士博還是婉拒，因為一旦參加他就無法「緊跟李博士的腳步」。不過，畢士博告訴羅紀，「我還是承諾，若沒妨害田野工作的話，我會試著調整我的時程表，好讓王儲陛下停留期間，我會在太原。因為我覺得，他作為執政君主之子的威望，以及對中國考古學的興趣，說不定對我們很有幫助」。[108]

檔案並無法透露畢士博與李濟相遇後發生了什麼事。不過，十一月三日，已回到太原的畢士博向李濟捎去一信。「我不需要告訴你，短暫地訪問你的『營地』(camp) 是多麼讓人開心的事；也不需要告訴你，對你與袁先生正在做的事，我是多麼的感興趣。當你決定該是劃下休止符、打包回北京的時刻，我預期，針對你的發現，我們會有相當有趣的討論」。畢士博也允諾，一旦回到北京，他會「立即沖洗你的照片，然後寄給你」。畢士博表示，「請務必讓我知道，我要怎麼幫你才是最好的，因為只有在總部與田野工作者間最完美的合作下，田野工作才能獲得最大程度的成功」（圖五）。[109]

此外，畢士博也與李濟討論西陰村遺址的定年問題。從畢士博的信件來看，當畢士博抵達西陰村遺址的時候，李濟與袁復禮已經掘出似乎是「舊石器起源」(Palaeolithic provenance) 的彩陶。畢士博大為所動。他在信中寫道，如李濟所知，至目前為止，彩陶出土的時代均屬新石器時代晚期，或說「銅石並用時代」（Aeneolithic; Chalcolithic Period；即新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間的過渡期）——如果西陰村遺址屬於舊石器時代，「這意指彩陶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且在最複雜的地

[106] Bishop to Lodge, August 13,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107] Bishop to Lodge, August 13,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108] Bishop to Lodge, December 27,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109] Bishop to Li, November 3, 1926, Tchengta Hotel, T’ai-yuan, Shansi,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形、氣候與無疑的異族影響下，未經歷多少變化」。至於李濟掘出的石器，畢士博猜測，「可能除了那似乎是箭頭的物件外，我於我短暫的行程中看到的石器碎片 (stone fragments)，如不是新石器時代的物件，便有可能是在加熱以把水燒滾時裂開的石頭碎片。[110]

畢士博也告訴李濟日前一樁震驚北京學術社群的大事。原來，在為瑞典王儲召開的歡迎會（1926 年 10 月 22 日）上，安特生宣布其長期的助手師丹斯基 (Otto A. Zdansky, 1894-1988) 日前於北京近郊掘出「兩枚人類的牙齒」——「相信可追溯至上新世晚期 (Late Pliocene)，且可能比海德堡人 (Heidelberg man) 或皮爾當人 (Piltdown man) 還要來得早」。緊接著，畢士博跟李濟說明瑞典王儲的行程：

> 瑞典皇儲一行人現在正在太原。午餐後，我將會與他們駕車逛逛，至一個明顯是史前的遺址。安特生在該址的北方三十里處掘到彩陶——雖說該址還未產出任何類似的發現。[111]

但從李濟與畢士博後來的通信來看，真正讓李濟警覺的，既不是關於遺址定年的問題，也不是師丹斯基的「兩枚人類的牙齒」，而是畢士博表示「華盛頓的朋友」已在構思是否要「終止在中國的工作」。

> 我想我們應該計劃，在這個冬天完成越多的事越好，且在春天重啟我們的工作。因為在他的上一封信中，羅紀講得很明白，除非我們可在目前的財政年度結束前(也就是明年六月底之前)，做出些成績，我們的預算將會終止，且考察隊將會被召回。[112]

十一月三日，畢士博便與瑞典王儲的考古團隊一同出發，驅車前往太原北方十英里處的遺址（畢士博認為該遺址屬於「新石器時代村落」）。整個下午，他們「滿臉黃土地挑揀、發掘出不少早期陶器」，然「皆為無彩繪且粗糙的器皿，飾以陰刻或更為尋常的籃子或織物飾紋」（「與我見過在美國印地安墓塚中得到的陶器

[110] Bishop to Li, November 3, 1926, Tchengta Hotel, T'ai-yuan, Shansi,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111] Bishop to Li, November 3, 1926, Tchengta Hotel, T'ai-yuan, Shansi,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關於此「兩枚人類的牙齒」於北京學術社群中引起的討論與後續發展，見戴麗娟，〈中國地質學及史前學發展初期之國際性格〉，頁 144-145。

[112] Bishop to Li, November 3, 1926, Tchengta Hotel, T'ai-yuan, Shansi,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不能說不像」，畢士博評論）。[113] 回到北京，畢士博關心的要務便是全力支援李濟與袁復禮於西陰村的發掘。十一月八日，李濟自田野致信福爾斯寇特（因為李濟認為，當他的信抵達北京時，畢士博應該還沒回到北京），表示「我們在這裡的工作相當順利，而我們的發現——絕多數為史前的——已經累積到相當規模」。李濟估計他們還要一個月才能完成工作——並且，當他計算「花錢的速度」，他認為還需五百圓，才能讓這發掘有個圓滿的結果。「你可以把這筆錢寄給我父親，他會把錢匯給我」，李濟指示福爾斯寇特。[114]

十一月十九日，畢士博從北京致信李濟，表示總部已經收到李濟十一月八日給福爾斯寇特的信（17 日下午抵達），且在十八日便由董光忠親自把五百圓的經費交給李濟父親。畢士博也將李濟拍攝的照片沖洗出來，附在信中供李濟參考。由於李濟沒有太多使用相機的經驗，畢士博也分享一些攝影祕訣。「有些照片相當不錯，其他的則曝光錯誤 (faulty exposure)。大部分我在山西拍的都很不錯——我歸功於我仔細地遵循我的衛爾康曝光計算機 (Wellcome Exposure Calculator)，我發現這計算機相當有用，特別對光線或暗的前景是相當重要的」。另外，畢士博也建議，當李濟結束工作，準備返回太原時，李濟可以寫信或拍電報給太原的英國浸禮教會 (Baptist Mission) 的一位達特 (R. H. Dart) 先生，然後報畢士博的名字。只要給達特兩週的準備期，畢士博寫道，達特應該可以派車去接李濟到太原。最後，畢士博再次勉勵李濟：

> 務必跟我保持緊密地聯絡——因為我想讓在華盛頓的上司知道這些消息。如你所知的，他們並不滿意在這裡的狀況，且已經認真的思考，是否該是終止這考察計畫的時候。目前看來，我們有絕佳的機會，可在今年冬天秀出個明確的成果。若我們可以做到這，且可以安排，讓我們的工作可在明年秋天在山西或其他地方持續下去，我想華盛頓的上司們應會改變心意。我的傾向是持續在你的「中國美索不達米亞」進行考古發掘，且把我們的經費與努力集中在那。[115]

---

[113] Bishop to Lodge, December 27,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114] Li to Furscott, November 8, 1926, Yün-Ching, Hotung, Shansi,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115] Bishop to Li, November 19, 1926, 19, Ta Yang I-pin Hutung, Peking,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十一月十三日，李濟從西陰村致信畢士博。「我剛收到你從太原寄出的、日期為十一月三日的來信」，李濟寫道：

> 自你離開後，我們日復一日地發掘——僅有幾天的干擾。我們掘出陶片目前已累積到超過二十箱，但目前我們還沒找到任何完整的陶罐。石器也相當豐富。我已經做了一張清單，列明精確的水平、位置與發現時間，數目已經超過六百件。許多都已經碎裂，但有些還被保持相當良好的狀態，且完整度相當高。在這些石器中，有相當多的燧石的箭頭，顯示相當細緻的工藝水平。也有不少的磨光的石器，惟大部分均處在碎裂狀態。不過，我們並未找到真正的半月狀矩形刀，而這物件在安特生的仰韶遺址中相當重要。我們的驚訝之一是，這個文化中的人已經以箭頭、矛頭等形式來利用赤鐵礦。將這些石器當成整體來看，石英與石英岩的使用最為普遍，其次是綠岩、石灰岩、砂岩與燧石。在較低的地層中，燧石器相對稀少。我們希望，在發掘結束後，我們能將這些石頭材料的來處予以定位。[116]

緊接著，李濟也概述除了陶器與石器外的主要發現，像是「存量也相當豐富的動物骨骼」、「一具未發育之年輕人的骨骸」等。「你或許會感到驚訝」，李濟寫道，「為什麼我沒就此遺址的性質說些什麼。理由是我還沒準備好。但我可以確定一件事：這是從石器時期留下的遺址」。

>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工作進展地相當緩慢；我們是有意識地這樣做，因為我們要確定我們移開的每一寸泥土。從目前的工作狀況來看，我可以說那已經是個成功。但我們決不因此自滿。這個遺址相當大，而我們揭露的部分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若僅基於這小地方的成果，我們便推斷這遺址的性質，這將會是災難性的。但我們不希望很急躁地探索整個遺址。我的信念是，若這一塊區域能被充分地探索，其他部分會自然地展開。[117]

「總之，這是個非常豐富的遺址」，李濟結論道，「從中做出個大故事是相當誘惑人的——但我認為不去做這件事是比較科學的」。[118] 在日後交給弗利爾藝術館的正式報告中，李濟也重申了此點：

---

[116] Li to Bishop, November 13, 1926, Hsi-yin-t'sun, Hsia-hsien, Shansi,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117] Li to Bishop, November 13, 1926, Hsi-yin-t'sun, Hsia-hsien, Shansi,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118] Li to Bishop, November 13, 1926, Hsi-yin-t'sun, Hsia-hsien, Shansi,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 近幾年來，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經證明中國北部無疑的經過了一種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西至甘肅東至奉天，他發現了很多這一類或類似這一類文化的遺址。因為這種發現，他們對於研究中國歷史上的興趣就增加了許多。這個問題的性質是極複雜的，也包括著很廣的範圍。我們若要得一個關於這文化明瞭的概念，還需多數的細密的研究。這個文化的來源以及他與歷史期間中國文化的關係是我們最要知道的。安特生在他的各種報告中對於這兩點已有相當的討論。他所設的解釋，好多還沒有切實的證據。這種證據的需要，他自己也認得很清楚。所以若是要得關注這兩點肯定的答案，我們只有把中國境內史前的遺址完全考察一次。不做這種工夫，這問題是解決不了的。自然，因此發生的問題不只這兩個；其餘的也是同等的重要，具同樣的興趣。我們現在的需要，不是那貫穿一切無味的發揮；我們的急需是要把這問題的各方面，面面都做一個專題的研究。[119]

十二月十五日，李濟從太原的一處旅館致信畢士博，表示他們於西陰村的考古工作已於十二月六日結束，光打包就花了一週，總計有七十六箱的陶片、石器、動物骨骼、土壤樣本等，由三臺推車裝運，以及十二匹強壯的騾子來拉。李濟承認，「如果我們有時間於田野做實驗室工作的話，其中很大部分可能都可被拋棄——但正因為我們沒有機會做這件事，我們於是決定把於這豐富的遺址上發現的東西全部帶回」。[120]

「在發掘期間我們度過了許多讓人發顫的小時」，李濟寫道，「簡直就是一個接著一個的驚喜」：

> 我相信我已經有了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我跟你保證，你會是第一個知道這發現到底是什麼的人。但我希望把這個驚喜留到聖誕節——也就是我回到北京的時點——再跟你說。我們是在昨天來到太原的，搭的是達特先生派過來的車。我們還不確定長官們關於我們把這些發現都帶到北京的態度。應該明天我們就會知道了。十天後見！[121]

---

[119] 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收入張光直、李光謨，《李濟文集》第 2 卷），頁 170。

[120] Li to Bishop, December 15, 1926, Chen-ta Hotel, T'aiyuan fu, Shansi,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121] Li to Bishop, December 15, 1926, Chen-ta Hotel, T'aiyuan fu, Shansi, Box 6, Folder 15,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八・「恭喜山西」

如李濟所預期的，李濟與袁復禮於耶誕節前抵達北京；而畢士博也收到了李濟給他的「聖誕禮物」——「一枚被切成兩半的蠶繭」。畢士博跟羅紀報告，要是能證實該蠶繭與曾經生活在該區之史前人類間的關聯，傳說中「中國古代即有相當發達之絲織產業的說法」，可能不是空穴來風。[122] 畢士博隨即構思該如何讓北京的學術社群得以欣賞李濟與袁復禮取得的成就。他隨即有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原來，十二月初，北京城內口耳相傳，吳佩孚有意出售新鄭銅器，以補軍費。引起畢士博注意，但無法決定是否要下手。十七日，他發給羅紀電報，尋求指示。出乎畢的意外，是國務卿科爾洛格 (Frank B. Kellogg, 1856-1937) 回電給他：「政策禁止購買銅器。恭喜山西」(Policy forbids bronze purchase. Congratulations Shansi)。[123]

來自國務卿的短訊讓畢士博深受鼓舞。他隨即構思，該如何以此為槓桿，擴大弗利爾藝術館於北京學術社群的影響力。一月十一日，他於北京旅館中舉辦了晚宴，邀請李濟、袁復禮、曹雲祥、赫定 (Sven Hedin)、安特生、葛利普、裘善元、布達生、鋼和泰（Alexander Staël von Holstein, 1877-1937；梵語學者，時任教於北京大學）、洛克斐勒基金會的史蒂文森等人赴宴。晚宴後，畢士博便請在場賓客移駕到另一房間，說他有要事宣布。當賓客坐定後，畢士博便邀請葛利普主持李濟與袁復禮的發表，而希望與會賓客能就兩位學者的發表加以評論（在致羅紀的信中，畢士博寫道赫定發表了相當有趣的、關於「文化擴散的地理面向」[geographical aspects of cultural diffusion]）。在討論告一段落後，畢士博便宣讀國務卿科爾洛格的賀電。在給羅紀的後續報告中，畢士博強調「晚宴相當成功，且有助於提升在中國考古學研究的興趣」。[124]

當畢士博努力以西陰村發掘來推動其考古事業、穩定網絡之際，李濟與清華也在做類似的事。畢士博樂觀其成，也參與了清華國學院召開的茶話會。事實上，畢士博觀察到，隨著北伐的推進，北京的學術氛圍有些微妙的轉變。舉例來說，二月十四日，畢士博參加了地質調查所的年度晚餐。與會民眾中約有六成為中國人，且其中多數對會議內容有著智識且進步的愛好者的興趣。外國人占了來賓名單的五分

[122] Bishop to Lodge, December 27, 1926,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6," *Central Files.*

[123] Bishop to Kellogg, January 11, 1927, Box 6, Folder 1,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124] Bishop to Lodge, January 23, 1927,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之一左右，包括了美國人、加拿大人、瑞士人、德國人與法國人，專業包括了地質學家、地理學家、動物學家、天文學家、考古學家、醫生、歷史語言學者(philologists)、人類學家等，而英文是會議中的主要語言。即將率隊前往「中國突厥斯坦」(Chinese Turkestan) 的赫定是主要講者，給了與會聽眾其考察活動之目標與裝備等細節，也表達想與不同國籍、不同學科之科學從業者展開合作的希望。畢士博告訴羅紀，「他所說的，也就是我長久以來在考古學中盡其所能地提倡的，只是他演說的技巧比我好得多」。值得注意的，畢士博認為，赫定的演講呼應了他對晚近北京學術社群的觀察。「四年前的中國社群瀰漫著冷漠、猜忌與懷疑的氣氛，當時的中國人還未找到自己，也還在痛苦於一九〇〇年時強加給他們的羞辱。他們合理的懷疑，所有的外國事業，像是我們在這邊的工作，目的都是為了要掠奪中國僅存的藝術寶藏」。畢士博告訴羅紀，今日的中國人已與四年前不同，人們似乎相信國民黨遲早會推至北京，獲得最後勝利。在一個新中國誕生前夕，畢士博觀察，中國人更願意去討論，與外國人合作，以及從事真實的科研工作。[125]

在這樣的氛圍下，畢士博發現，不僅赫定的西北考察團已箭在弦上，而安特生正與步達生規劃一趟到塔里木盆地的三年期考察，「往西追溯彩陶的源頭」。在這樣躁動、躍躍欲試的氛圍下，畢士博自然急著向羅紀證明，李濟帶回來的七十六箱發掘所得，當中或許有不少是「垃圾」，但還是足以在中國史前考古學上留名。此外，畢士博也表示，安特生「讓人驚豔的」彩陶標本均來自墓地，但西陰村遺址似乎是個村落或小聚落 (hamlet)。例如，安特生並未在他的發掘中找到任何房屋遺址，李濟與袁復禮似乎找到一面可界定家屋格式 (house plan) 的一面牆，形狀為卵形，有著下陷的地板，以及在一旁的儲藏穴等。[126]

至於李濟何時會完成西陰村發掘的整體報告，畢士博向羅紀表示，李濟目前的問題是，手邊沒有足夠的期刊與專書，讓他們著手比較研究。因此，畢士博寫道，若李濟能在這個夏天前往華盛頓研究的話，他有可能做出對科學的貢獻。「他的訓練非常好，勤奮、充滿能量與熱誠，他可說是年輕一代學者中最有能力的，且贏得全國的聲譽。之前他以中方代表的身分受邀參與泛太平洋會議便是最好的證明」。此外，畢士博認為，若李濟能前往華盛頓從事研究，對正在展露頭角的北京學術社

[125] Bishop to Lodge, March 3,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26] Bishop to Lodge, March 3,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群來說，這不啻是美國之「友好」的證明，對於任何美國機構於中國事業的推展將會有正面的影響。「其他的國家，像是英國、俄國、瑞士、日本與法國，均竭盡全力地贏得中國知識分子的友誼。至於美國，是中國知識分子傾向於結盟的國家，卻獨自地表現冷淡與事不關己的態度」。畢士博認為，若羅紀能答應他的請求，讓李濟能在夏天到華盛頓從事研究，與當地各組織有著更親密的聯繫，然後再回國，將會喚醒中國知識分子的記憶，也就是美國與中國間一度相當緊密的友誼。同時，畢士博相信，這樣的美國行也會增強李濟的名望與動機，讓他可持續在山西的工作。[127]

在給羅紀的報告中，畢士博重申，他可以體會羅紀想看到具體成果的心情，但他還是認為，弗利爾藝術館在華工作的「當務之急」，「與其說是執行某些特定的研究，倒不如說是讓研究得以成為可能」。這幾年在中國的經驗已經讓他體會，中國人至今沒有任何關於「透過合作以達成共同目標」這樣的概念。羅紀大概無法想像，畢士博嘆道，他得日復一日、夜復一夜地與各種「狹隘的、短視的猜忌」搏鬥。[128] 以李濟的工作為支點，畢士博強調，他可以「在這裡的知識分子與有影響力的階級中，喚起足夠的理解與興趣——唯有如此，任何工作才足以成為可能」。[129]

當李濟埋頭於實驗室工作之際，畢士博決議要展開一個少有外國人膽敢嘗試的「田野工作」：考慮到僅僅是揮軍北伐，國民黨的氣勢已足以讓北京學術的氣氛為之一變，他決定要到漢口，試著與國民黨的核心人物會面。「我希望很快的就可以跟你報告些有趣的東西」，畢士博告訴羅紀，「若我們幸運的話，我應該能把一半的中國打開 (open up half China)，以前所未見的方式展開科學研究」。[130]

九・「弗利爾藝術館，萬歲！史密森研究院，萬歲！」

除了支持李濟的實驗室工作，以及構思他的田野工作，畢士博並未忘記推進李濟避之唯恐不及的燙手山芋：將收購所得的中國文物運出中國。一九二七年二月二

[127] Bishop to Lodge, March 3,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28] Bishop to Lodge, February 2, 1927, 19, Ta Yang I-pin Hutung,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29] Bishop to Lodge, January 23, 1927,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30] Bishop to Lodge, March 3,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日，畢士博致信羅紀，希望羅紀能儘快撥給下半年的資金。緊接著，他跟羅紀報告，他已跟軍方確認，他這幾年來搜集的古物會在秦皇島上船，至於北京到秦皇島的運輸則會在海軍陸戰隊的護送下以鐵路為之。[131] 三月三日，畢士博再次致信羅紀，表示他已與軍方協調出更好的方案。他從一九二三年三月以來透過收購等方式取得的中國古物、古董、書籍等共二十三大箱，目前在海軍陸戰隊的運輸船「湯瑪斯」上，會先到秦皇島，再轉至舊金山。由於軍方的支援，他為藝術館省了從北京到秦皇島，以及從布魯克林到華盛頓的兩段運費。此外，正如他期待的，由於他身為史密森研究院之在華工作的負責人，他得以宣稱這二十三箱為美國政府財產，從而避免在中國海關開封查驗的危險與不必要的紛擾。[132]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羅紀久違地致信畢士博，指出他正焦慮地等待畢士博於山西收穫的果實。與之同時，羅紀寫道，他已經得到戰爭部 (War Department) 的通知，即畢士博於中國收購的物品可透過美國的軍事部門運至館內。「我很自然地懷疑」，羅紀寫道，「會不會有些來自山西的史前所得也會與其他物件一同出現」。羅紀接著說他不會堅持此點——畢竟，畢士博會需要這些物件以從事進一步研究。[133]

至於畢士博津津樂道的、來自國務卿科爾洛格的賀電，羅紀戲謔地寫道，據他所知，即便賀電上有國務卿的簽字，但他應該對此完全不知情——而事實上這他渾然不知情的賀電，大概是國務卿發過的最有智慧的賀電。既然國務卿的電報讓畢士博的團隊大有「面子」，他覺得無妨，就讓這檔事成為畢士博與他之間的秘密。至於新鄭的銅器，羅紀寫道，他相信這批銅器很快地就會出現在某些古物商的手中，光明正大地在美國的藝術市場上求售，屆時，藝術館就可名正言順地購買科爾洛格聲稱禁止購買的寶藏。[134]

在畢士博忙著跟華盛頓的總部打交道、讓他於中國的考古工作不會遭到終止之際，他與李濟間的張力逐漸浮現。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李濟致信畢士博，指出

---

[131] Bishop to Lodge, February 2, 1927, 19, Ta Yang I-pin Hutung, Peking,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32] Bishop to Lodge, March 3,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33] Lodge to Bishop, February 7,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34] Lodge to Bishop, February 7,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他對於來年春天的勘察已有了一些想法，希望能儘快有機會面對面討論。他現在正準備將於四月在北京博物學會上的發表，李濟告訴畢士博，講題為「人體測量學的三個序列」(Three Series of Anthropometrical Measurement)。準備這場演講已耗費掉他多數的時間，李濟寫道，一旦演講結束，他保證會將全部的精力放在來年的考古工作上。李濟緊接著勾勒他心目中理想的田野考古模式：在田野設置工作站，讓他能持續兩年或三年的考古工作。他預計在三月二十五或二十六日間進城，希望屆時能與畢士博就此交換意見。[135]

畢士博於三月二十一日回信，指出他早已跟羅紀提出類似的構想，而他很確定總部會願意支持李濟。甚至，畢士博寫道，弗利爾藝術館會出資，讓李濟可在夏天赴美進修。只是，畢士博寫道，他剛收到羅紀的回信，信中羅紀以威脅的語氣指出，如果他們不能在今年春天秀出成果，負責掌管弗利爾遺產之應用方式的委員會將會拒絕撥給經費——也就是說，已經有個好的開始的西陰村發掘將會無以為繼。[136]

李濟於三月二十三日回信，表示他會在週五進城，希望能有機會見到畢士博，緊接著他就要去參加北京博物學會的發表。他並不清楚「秀出成果」到底是指要他趕快完成報告，還是要他趕快出田野。李濟表示他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狀況」：他在清華的職位「多少是在臨時的基礎上」，導致他必須以教學來正當化他的身分；而同樣的，他與弗利爾藝術館的聯繫也從未正式地確立。如果說羅紀不願意繼續支持他的考古事業，李濟表示他應該就失業了，因為清華沒辦法給他一個正式的職位。但李濟也說他不會過於擔心，反正「在中國疆界中，我想去那就去那」。[137]

畢士博自然不願意讓李濟失業——因為李濟的失業也代表他的失職。不過，讓畢士博擔憂的是，北京學術社群中樂於討論及合作的學術氣氛似乎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138] 依其所見，此轉向至少涉及如下因素。首先，原本帶給北京學術社群與畢士博無窮希望的國民黨正面臨分裂，一邊是以蔣介石為首的派系，另邊則是披著國民黨員外衣的共黨分子。為了要了解此詭譎的氣氛下，到底有多少機會可持續

[135] Li to Bishop, March 17,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6, Folder 16,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136] Bishop to Li, March 21, 1927, 19, Ta Yang-Pin Hutung, Peking, Box 6, Folder 16,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137] Li to Bishop, March 23, 1927, Tsing Hua College, Peking, Box 6, Folder 16,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138] Bishop to Lodge, March 3,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在山西的田野考古，畢士博於三月的某個週二邀請丁文江、李濟與協和醫院的史蒂文森晚餐。丁文江認為畢士博可以試著與國民黨建立聯繫，但不是現在——還是等蔣介石清黨之後比較合適。丁文江也告訴畢士博，他認為國民黨會在半年至一年間控制北京，但整個局勢的穩定還是得花很多時間。[139] 李濟也隨即帶來讓畢士博憂心的消息。原本畢士博與李濟深信來年可繼續在山西展開田野考古，因為「清華的曹校長是閻錫山的好朋友，他們間的友情可以確保我們在山西的工作」。但現在，過去保持中立的閻錫山似乎決定投向國民黨——具體表現在閻辭去省長一職，轉任國民黨的軍事指揮官。「我們不清楚閻錫山如此做的目的何在」，畢士博告訴羅紀，「但我擔心山西遲早會被捲入戰火中——這樣的話，在那邊的工作將會不可行」。[140]

不僅如此，國民黨黨內的分裂還迅速波及北京。一九二七年三月間，畢士博認為，既然前往漢口拜會國民黨高層已然無望，他決定去韓國參訪瑞典王儲大力推薦的考古發現，也趁機參與於京都帝國大學召開的中國與日本考古學會議。不過，當畢士博甫抵達日本，北京即傳來「令人驚恐的消息」，讓他不得不更改行程，連夜趕回北京。原來，在北京駐華外交團 (Corps Diplomatique) 的同意下，北京當局搜查了俄國大使館，並逮捕了大量俄國與中國共黨分子，理由是他們已掌握確實的證據，顯示這些共黨分子正在密謀武裝暴動。「幾乎全部的外國婦孺全被送到天津、大連、首爾與京都，以及其他的安全地方」，畢士博向羅紀報告。[141]

第二則涉及北京學術社群日漸高漲的「排外情緒」。在一封日期為三月十八日的信件中，畢士博向羅紀報告關於赫定之西北考察團逐漸出現的懷疑。論者指出，在科學活動之餘，赫定也在調查漢莎航空 (Lufthansa) 往北京的適合著陸點。[142] 一個月後，畢士博再向羅紀報告，赫定花了這麼多工夫，把一隊裝備良好、組織完善的歐洲科學家帶來中國，準備在塔里木盆地大顯身手，結果，「他已經在這好幾個月了，而中國人一再堅持他得反覆修改他的計畫，直到整個考察既非瑞典，也非中

[139] Bishop to Lodge, March 18,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40] Bishop to Lodge, April 18, 1927, 6, North Compound, P.U.M.C.,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41] Bishop to Lodge, April 18, 1927, 6, North Compound, P.U.M.C.,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42] Bishop to Lodge, March 18,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國與瑞典，而就是中國的」(until now his expedition is no longer Swedish, or even Sino-Swedish, but Chinese)。更糟的是，畢士博寫道，儘管赫定的團隊有為數不少的中國人，且赫定也不再擁有考察計畫的主導權，赫定還是得支付整個考察隊的費用，甚至是中國成員的工資。[143]

安卓思的考察也不順遂。依據董光忠與李濟的消息，畢士博向羅紀報告，安卓思汲汲營營地為自己爭取曝光率、尋求贊助、甚至不惜將恐龍蛋於市場上拍賣的手法，已經被中國人認為，所謂的中亞考察不過是個「商業與牟利的事業」(a commercial and profit-making enterprise)。畢士博寫道，有名中國人向他表示，如果每顆恐龍蛋值五千美金，為什麼中方反倒一無所獲？「我要屬於我們的那五千美金」。[144]

到底是誰在背後煽風點火、挑動中國學術社群的排外情緒、導致任何由外國人主持的田野考察淪為紙上談兵？一直努力幫赫定之考察能順利成行的安特生，告訴畢士博一個內幕消息，即有些人認為畢士博是幕後的主導者。[145] 不過，畢士博告訴羅紀，依據他自中國方打聽到的消息，真正引發此爭議的是安特生。畢士博寫道，安特生是位彬彬有禮的紳士，但在與中國人互動時，還是不時以鼻孔看人。更糟的是，畢士博寫道，兩三年前，安特生與丁文江達成協議，將其在河南與甘肅採集到的新石器時期彩陶帶回瑞典研究，且允諾在研究後會將之歸還給北京——不過，當兩三年後，安特生似乎沒有歸還古物的打算時，耳語開始傳開來，認為丁文江與安特生已將該批古物售出，在賺夠了錢後，現在正在避風頭。[146]

---

[143] Bishop to Lodge, April 18, 1927, 6, North Compound, P.U.M.C.,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44] Bishop to Lodge, April 18, 1927, 6, North Compound, P.U.M.C.,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45] 在一封致安特生的信件中，畢士博猜測，他之所以會被捲入這場混水，是因為讓西陰村發掘得以完成的兩個關鍵機構——清華國學院與地質調查所——均在此排外風潮中扮演關鍵角色，而他不免會被視為是這些民族主義者的同情者甚至盟友；見 Bishop to Lodge, March 15, 1927, 19, Ta Yang I-pin Hutung, Peking, Box 2, Folder 2, *Central Files*。

[146] Bishop to Lodge, March 18,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有趣的是，畢士博對此還寫了封信給安特生澄清。在這封日期為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的信件中，畢士博表示，據他掌握的消息，在背後操縱輿論走向的始作俑者其實是日本考古學者，目的在於排除西方學者，從而獨占中國考古學的研究領域。不過，畢士博也告訴安特生，這樣的消息也可能是子虛烏有——因為，按照他與日本考古學者互動的經驗，日本考古學者一直抱持著相當開放與樂於合作的態度。Bishop to Lodge, March 15, 1927, 19, Ta Yang I-pin Hutung, Peking, Box 2, Folder 2, *Central Files*。

至於安卓思，畢士博認為，這位美國探險家之所以會陷入如此困境，該歸咎的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安卓思愛逛俱樂部與玩馬球 (polo)，當他在北京的時候，他只願跟英國人接觸，對於中國人不屑一顧。[147] 總之，畢士博認為，赫定、安特生與安卓思均把中國當成「地理的表現」(geographical expression)，中國人到底如何思考，一點也不重要。畢士博表示，早在一九一五年，他已察覺此舉的不當——這也是為何他花這麼多的時間在教育「中國已受教育的階級」。畢士博告訴羅紀，相較於佛格博物館、自然史博物館與赫定看來會歸於泡影的西北考察，弗利爾藝術館被允許做任何想做的事。「我從未聽到對於我們工作的批評。我們被視為朋友，是歷史博物館與清華願意合作的朋友」。[148]

但即便是歷史博物館與清華的「朋友」都不能免疫於北京高漲的排外情緒。某日畢士博與一名中國人起了爭論。該名中國人堅持中國人應做自己的科學工作，而不是由外國人替他們做。畢士博同意，接著要這名中國人列出一份名單，秀出到底有哪些中國人是有資格做科學工作。結果，「這名中國人的表情就像魚刺梗住了喉嚨，整個臉一片通紅」。[149] 事實上，畢士博告訴羅紀，在與清華國學院及歷史博物館協商的過程中，有好幾回他都差點爆發——所幸他都按捺住了。[150]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畢士博做了個艱難的決定。十三日，他發了封電報給羅紀，指出目前的田野工作是毫無希望的，請求下一步指示。他隨即收到一封來自秘書長阿伯特的回訊，指出史密森研究院高層也得到同樣的結論，要求畢士博立即打包返美。四月十八日，畢士博致信給羅紀，指出阿伯特的決定讓他陷入天人交戰，似乎超過十年的田野工作還是歸於泡影。不過，畢士博告訴羅紀，他安慰自己，「一旦這個國家歸於平靜，我們應該可以發現到許多老舊的偏見消失，而考古學真正的興趣將會在中國人之間萌生」(once the country does settle down, we shall find

[147] Bishop to Lodge, March 18,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48] Bishop to Lodge, April 18, 1927, 6, North Compound, P.U.M.C.,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49] Bishop to Lodge, March 18,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50] Bishop to Lodge, April 22,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many of the old prejudices disappear, and a real interest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spring up among the Chinese themselves)。[151]

不過，當十年前的畢士博只能失意的打包、懷著「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到中國、繼續其考古事業」的心情離開北京，一九二七年的畢士博顯然已經不同——因為他再也不是獨自一人，而是有兩位值得信任的助手，一位長於打點田野與辦公室雜務，另位則是北京學術社群中最耀眼的一顆新星。在與華盛頓的總部協商、保證即便他人不在中國、董光忠與李濟也絕不會辜負弗利爾的遺願後，秘書長阿伯特同意繼續僱用兩位中國助手，聘期至少一年，依兩人表現決定是否續聘。[152] 在得到阿伯特的首肯後，畢士博便與董光忠及李濟擬定未來的計畫。董光忠首先會參與京都帝國大學於滿洲的發掘，接著他會回到宜昌，並以此為基地，探索在長江流域具潛力的考古地點。至於李濟，畢士博的計畫是要李濟先完成西陰村的發掘報告，緊接著李濟得攜帶部分值得深入研究的樣本拜訪史密森研究院，於該院的實驗室與圖書館進行更細緻的比較研究。在「神泉之地」中「充盈他更新的靈感與能量」後，畢士博希望李濟能回到山西，在西陰村或其他深具考古價值的田野地建立工作站，從而展開長期與翔實的考古田野工作。[153]

一九二七年四月，畢士博啟程返美，結束了為期約四年的中國田野工作，而李濟則成為弗利爾藝術館在華考古事業的負責人。兩人下回碰面便是李濟在完成西陰村的發掘報告、將部分關鍵標本帶到史密森研究院從事進一步研究之時。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六日，當李濟剛結束其在史密森研究院的訪問行程、取道歐洲返華之際，這名三十二歲的考古學者顯然無法壓抑他對畢士博的感謝。他從「奧林匹克」號上捎了封感謝信給畢士博：

> 當我在十日離開你的時候，我的心情是糾結的，就像我在一九二三年離開溫哥華時一樣。在那個時點，我想我再也無法重訪美國——但不可能的事就在五年內發生了！人類的命運是多麼地難以逆料！在我待在美國這段時間，我不相信我已經說了夠多來謝謝你為我所做的。你知道得很清楚，就像我也明

[151] Bishop to Lodge, April 18, 1927, 6, North Compound, P.U.M.C.,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52] Bishop to Lodge, April 22,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

[153] Bishop to Lodge, April 22, 1927, location unidentified,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7," *Central Files*；「神泉之地」語出 Bishop to Lodge, October 16, 1925, location unidentified, *Central Files*。

白，有些感受是不能以詞語表達的。但至少我相信，在生命更高的國度中，地理界限並不存在。弗利爾藝術館，萬歲！史密森研究院，萬歲！[154]

一九二八年的畢士博與李濟均無法預料，三個月後，當李濟來到廣州，他會受「古典學者」傅斯年的邀請，加入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持該所剛啟動的「安陽發掘」；更無法預料安陽發掘又會反過來摧毀兩人五年的友誼與合作關係，這就屬於另一段故事了。[155]

十・結論

在中國近代考古學史的書寫上，李濟顯然不是個可被忽略的人物。即便如此，除了勾勒李濟如何以一己之力主導如西陰村發掘這樣「中國人第一次的田野考古工作」，便是聚焦在李濟如何與傅斯年這樣兼具現代與古典學術訓練的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為基地、以安陽發掘開啓新中國獨樹一幟的學術傳統，少有研究者追問李濟所置身的國際學術網絡為何？體質人類學出身的李濟為何得以轉型為考古學者？誰讓李濟於哈佛就讀期間夢想的「刨墳掘墓」、「斷碑尋古蹟」成為可能？本文主張，回答前述問題的關鍵為李濟「最感謝」的人——美國考古學者畢士博。本文大量運用目前典藏在史密森研究院檔案館、弗利爾藝術館、賓大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館的畢士博相關史料，盡可能地回答畢士博是誰、誰基於何種目的把畢士博送到中國、畢士博又基於何種考量接觸李濟、資助李濟的目的何在等問題。本文期待，這樣根基於英文一手史料的研究視野，一方面能延續戴麗娟、陳星燦、馬思中、范發迪、沈德容等研究者關切的「國際性格」，另方面也因畢士博作為史密森研究院在華事業的領導者，得以為日前蓬勃發展的田野科學史提供新意。以下便從史料與理論兩層次來總結本文貢獻。

先從史料層次而論，本文彰顯了畢士博相關史料的三點價值。首先，如戴麗娟指出的，在論及中國近代地質學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之外國探險家與學者時，研究者對其生平、資歷與業績等基礎資訊都還有待更細緻地掌握——我認為，這樣的批評

[154] Li to Bishop, August 16, 1928, On Board S. S. Olympic, White Star Line, Box 6, Folder 18,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155] 李濟在以下信件中跟畢士博說明與「古典學者」傅斯年會面的經過：Li to Bishop, November 28, 1928, Box 6, Folder 19,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同樣也適用於李濟這個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身上。[156] 目前研究者在處理李濟的生平、資歷與業績時，除了仰賴李濟的回憶錄外，便是李濟之子李光謨所整理的史料與詮釋。從李光謨已出版的研究與史料集來看，他似乎意識到史密森研究院與弗利爾藝術館藏有李濟的一手史料，也曾前往華盛頓從事移地研究。不過，從最後成果來看，李光謨相當片面地運用兩處典藏的李濟相關史料，其詮釋也有值得商榷之處。此外，值得指出，從目前以李濟為中心的研究來看，絕多數是從李濟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擔任史語所考古組主任後開始，關於李濟的「博士後」時期（即 1925 年 6 月加入畢士博團隊，同時兼任清華國學院講師為始，至 1930 年 6 月向畢士博遞出辭呈，專任史語所考古組主任）——乃至於李濟於此時期中嘗試的田野考古工作（如 1923 年參與新鄭古墓的發掘、1926 年的汾河流域探勘與西陰村發掘等）——多半語焉不詳。本文填補了前述研究史的兩處缺口。

其次，本文呼應晚近科學史研究中的在地取向，認為即便是所謂歐美科學，研究者仍有必要細究其在地性。更具體地說，研究者有必要細究個別科學社群與機構所處的在地關係與脈絡，探討其如何讓特定的科學事業成為可能，並發展出獨特的在地特色。在細讀畢士博與羅紀間的通信後，且與同時期同樣在華從事考察的安卓思做比較，我認為，由史密森研究院支援、畢士博領導的中國考古考察具有如下特色：(1) 由於其官方立場使然，當畢士博在構思其策略與步驟時，必得小心翼翼，避免其作為成為中美外交衝突的根源；(2) 雖說畢士博的官方立場讓他少了不少自由度與知名度，此特殊立場倒也是其考察得以略有所成的關鍵。我們已經看到，在當時中國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中，畢士博仍然可將購得的文物運出中國，關鍵在於，作為史密森研究院在華代表的畢士博，於中國購得的古物均屬美國政府財產，中國政府無權查驗——甚至，我們也看到，此特殊立場讓他可獲得美國軍方的協助，順利將古物從北京運至華盛頓。

第三，由前述科學的在地性出發，我認為畢士博相關史料可幫助研究者重新思考如畢士博、安卓思、安特生等常駐中國的外國科學家及學術社群。在畢士博致羅紀的報告中，處處可見他對其外國同儕的評價，以及環繞在個別外國科學家的流言蜚語。本文不認為這些史料只是些八卦而不予處理——相反的，這些八卦反倒凸顯外國在華科學社群的內在異質性——換言之，中國近代學術史的研究者不能簡單使用「外國人 vs. 中國人」此二元對立來掌握歐美學術傳入近代中國時的動態，而有

[156] 戴麗娟，〈中國地質學及史前學發展初期之國際性格〉，頁 138-139。

必要正視在華外國科學社群的派系，以及個別派系與中國科學派系間的衝突與協商。我認為，如此將歐美科學社群予以在地化，避免將之視為鐵板一塊，正可呼應後殖民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核心題旨。誠如戴麗娟所說的，研究者不能「逕將外國考古者一律視為掠奪者」、「因此忽略實質且客觀的研究」，此後殖民科技與社會研究的視野，或可為研究者從事「實質且客觀的研究」時的焦點所在。

再就理論層次而論，呼應晚近科技與社會研究者對拼裝說的興趣，本文試著論證，田野既不僅是讓觀察、採集、標本製作、編目等實作得以發生的舞臺，也非純由科學家透過精緻巧妙的「邊界工程」(boundary work) 畫出的容器——田野是一團揉合人與非人、無以名狀、雖然穩定卻又不時在崩解邊緣的拼裝。那麼，在這樣的視角下，像畢士博這樣的田野科學家又是誰？本文的回答是，田野科學家是把眾多人與非人之元素組合在一起的拼裝者，而不是高瞻遠矚、胸懷鴻鵠之志的工程師。我認為此視野有助於深化近代中國學術史晚近的重要突破：即就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科學社群而言，當他們接觸到如地質學、考古學、博物學、漢學等西學時，讓他們感到驚豔的，與其說是這些西方知識體系的精巧與複雜，倒不如說是該體系所強調的，所謂的科學研究，絕對不是在書齋中皓首窮經而已，而是得走出戶外，運用所有的感官，「以身為度」地「做田野」。簡言之，依照近代中國學術史研究者的說法，不論從歷史行動者的角度，還是當代研究者的後見之明，「田野」與「田野工作」均為理解中國近代學術史的關鍵詞。[157]

最後，讓我回到李濟於一九二七年出版的那段謝詞：「他所注重的是科學的考古，代表的是那史密森研究院的一句格言的真精神——『為了知識的增進』；不是那尋常的古董收集者。」[158] 顯然的，此處李濟是在重申畢士博於信件中的自我定位，即畢士博的中國行是為了更崇高的目標，而非以文物取得為目的。然而，本文分析顯示，史密森研究院的官方色彩不僅讓畢士博可合法地將購得的中國文物運至美國，所謂「知識的增進」也不見得如李濟所述般地無邪與無私。畢士博還是那「尋常的古董收集者」——但關鍵是研究者有必要重新理解如採集、做田野與蹲點等田野實作的「尋常性」。在一篇發表在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的文章中，科學史研究者恩德斯比 (Jim Endersby) 總結長年就英國植物學家胡克 (Joseph D. Hooker, 1817-1911) 的研究心得，以「更平凡的人生：約瑟夫・達頓・胡克無聊

[157] 關於田野工作於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性，見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杜正勝，《新史學之路》，頁 91-156；Shen, *Unearthing the Nation*, chap. 2。

[158] 李濟，《西陰村史前的遺存》（收入張光直、李光謨，《李濟文集》第 2 卷），頁 169。

的人生但有趣的時光」(a life more ordinary: the dull life but interesting times of Joseph Dalton Hooker) 概括之。[159] 儘管恩德斯比並未處理本文關切的「田野是如何做出來」的問題，我認為該標題不僅呼應李濟的「不是那尋常的古董收集者」，同時帶出實作轉向 (practice turn) 後科技與社會研究的基本立場：貌似最尋常的科學實作往往蘊含了最非比尋常的理論洞見。

（本文於民國一〇七年一月八日收稿；一〇八年十月二十四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的研究與寫作過程相當漫長；我要感謝戴麗娟、臧振華、邱鴻霖、李尚仁、吳方正、Pamela M. Henson 與 David Hogge 等師長在過程中的指導，以及游立安協助整理史料。我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與編委會的修改建議，讓本文更臻完善。

[159] Jim Endersby, "A Life More Ordinary: The Dull Life but Interesting Times of Joseph Dalton Hook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44.4 (2011): 611-631.





圖一之一、二：畢士博於新鄭及鄭州衙門內拍攝的照片
（資料來源：位於 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1923,” *Central Files*）



圖一之三：畢士博於新鄭及鄭州衙門內拍攝的照片



圖二：裘善元寄給羅紀「惠存」的個人照
（資料來源：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une 1925-November 1925,” *Central Files*）



圖三：於總部工作的畢士博
（資料來源：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une 1925-November 1925,” *Central Files*）



圖四：畢士博拍攝的方山地景，隆起者為墓塚
（資料來源：Box 3, Folder “Bishop Correspondence, June 1925-November 1925,” *Central Files*）



圖五：西陰村的發掘照片，攝影者極可能是李濟或袁復禮
（資料來源：Box 20, Folder 9, 913.320-15, *Carl Whiting Bishop Collection*, FSA.A.02,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rchives）

引用書目

一・檔案材料

Carl Whiting Bishop Collection. FSA.A.02.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rchiv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s Papers (Circa 1919-1930s). Research Library,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Central Files (1919-1986). SIA Acc. 03-018.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chives, Washington, DC.

Field Expedition Records (1914, 1923-1942). SIA Acc. 02-051.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chives, Washington, DC.

The Carl W. Bishop Papers. The Penn Museum Archives, Philadelphia.

二・近人論著

王汎森著，王曉冰譯

2013 〈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臺北：聯經，頁 377-416。

王道還

1998 〈史語所的體質人類學家——李濟、史祿國、吳定良、楊希枚、余錦泉〉，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163-187。

杜正勝

2004 《新史學之路》，臺北：三民。

李光謨

2004 《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李尚仁

2012 《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臺北：允晨文化。

李濟著，張光直、李光謨編

2006 《李濟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2, 5 卷。

岱峻
2009 《李濟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洪廣冀
2016 〈科技研究中的地理轉向及其在地理學中的迴響〉，《地理學報》83：23-69。
2019 〈中國即田野——畢士博及中國於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學術界的地位〉，《新史學》30.1：117-166。
查曉英
2012 〈「正當的歷史觀」：論李濟的考古學研究與民族主義〉，《考古》6：82-92。
陳星燦
1997 《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 1895-1949》，北京：三聯書店。
傅斯年
2003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十八年度報告〉，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 6 卷，頁 57-111。
臧振華
2015 〈李濟與殷墟發掘：一個學術史的透視與省思〉，李永迪主編，《紀念殷墟發掘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9-24。
戴麗娟
2008 〈周口店發掘時代的一名法國顧問——以新近出版的德日進書信集為基礎材料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95-161。
2013 〈中國地質學及史前學發展初期之國際性格：從德日進寄至法國的一張餐卡看起〉，《古今論衡》25：133-166。
Basalla, George
1967 “The Spread of Western Science: A Three-Stage Model Describes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Science into Any Non-European Nation.” *Science* 156.3775: 611-622.
Brown, Clayton
2008 “Making the Majority: Defining Han Identity in Chinese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Browne, Janet
2002 *Charles Darwin: The Power of Place*. New York: Alfred Knopf.

Chakrabarty, Dipesh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hen, Warren I.

1992 *East Asian Art and American Culture: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eLanda, Manuel

2016 *Assemblage The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Elshakry, Marwa

2010 "When Science Became Western: Historiographical Reflections." *Isis* 101.1: 98-109.

Endersby, Jim

2011 "A Life More Ordinary: The Dull Life but Interesting Times of Joseph Dalton Hooker."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44.4: 611-631.

Fan, Fa-ti

2008 "Science in Cultural Borderlands: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Science, European Imperialism, and Cultural Encounter."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2: 213-231.

Gieryn, Thomas F.

2018 *Truth Spots: How Places Make People Believ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nson, Pamela M.

2000 "Spencer Baird's Dream: A U.S. National Museum." In *Cultures and Institutions of Natural History: Essay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ited by Michael T. Ghiselin and Alan E. Levito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pp. 101-126.

Johansson, Perry

2012 *Saluting the Yellow Emperor: A Case of Swedish Sonograph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Kohler, Robert E.

2006 *All Creatures: Naturalists, Collectors, and Biodiversity, 1850-195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Finders/Keepers: Collecting Sciences and Collecting Practice." *History of Science* 45.4: 428-454.

2011 "History of Field Science: Trends and Prospects." In *Knowing Global Environments: New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Field Sciences*, edited by Jeremy Vetter.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pp. 212-240.

Kohlstedt, Sally Gregory

2005 "'Thoughts in Things': Modernity, History, and North American Museums." *Isis* 96.4: 586-601.

2011 "Place and Museum Space: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American West." In *Geographies of 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 edited by David N. Livingstone and Charles W. J. Wither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399-438.

Lai, Guolong

2018 "Digging up China: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ism in the Yinxu Excavation, 1928-1937." In *Unmasking Ideology in Imperial and Colonial Archaeology: Vocabulary, Symbols, and Legacy*, edited by Bonnie Effros and Guolong Lai.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Press, pp. 83-119.

Lakoff, Andrew

2017 "A Fragile Assemblage: Mutant Bird Flu and the Limits of Risk Assessment."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7.3: 376-397.

Latour, Bruno

1983 "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Move the World." In *Science Observed*, edited by Karin D. Knorr-Cetina and Michael Mulkay. London: Sage, pp. 141-170.

1996 "On Actor-Network Theory: A Few Clarifications Plus More Than a Few Complications." *Soziale Welt* 47: 369-381.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w, John

1986 "On the Methods of Long Distance Control: Vessels, Navigation and the Portuguese Route to India." In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John Law.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p. 234-263.

Lawton, Thomas, and Thomas W. Lentz

1998 *Beyond the Legacy: Anniversary Acquisitions for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the Arthur M. Sackler*.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Livingstone, David N.

2003 *Putting Science in Its Place: Geographie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gócsy, Dániel

2017 "A Long History of Breakdowns: 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47.3: 307-325.

Meyer, Karl Ernest

2015 *The China Collectors: America's Century-Long Hunt for Asian Art Treasur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Mol, Annemarie, and John Law

1994 "Regions, Networks and Fluids: Anaemia and Social Topolog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4.4: 641-671.

Müller, Martin, and Carolin Schurr

2016 "Assemblage Thinking and Actor-Network Theory: Conjunctions, Disjunctions, Cross-Fertilisation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1.3: 217-229.

Naylor, Simon

2005 "Historical Geography: Knowledge, in Place and on the Mov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5: 626-634.

Netting, Lara Jaishree

2013 *A Perpetual Fire: John C. Ferguson and His Quest for Chinese Art and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Newmeyer, Sarah L.

1987 "The Carl Whiting Bishop Photographic Archive i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 Resourc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Archaeology, Geology, Topography, Flora, Fauna, Customs, and Cultur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 82.1: 23-28.

Ophir, Adi, and Steven Shapin

1991 "The Place of Knowledge: A Methodological Survey." *Science in Context* 4.1: 3-22.

Porter, Theodore M.
2006 "Is the Life of the Scientist a Scientific Unit?" *Isis* 97.2: 314-321.
Powell, Richard C.
2007 "Geographies of Science: Histories, Localities, Practices, Futur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1.3: 309-329.
Pyne, Kathleen
1996 "Portrait of a Collector as an Agnostic: Charles Lang Freer and Connoisseurship." *The Art Bulletin* 78.1: 75-97.
Rader, Karen A., and Victoria E. M. Cain
2014 *Life on Display: Revolutionizing U.S. Museums of Science and Natural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aj, Kapil
2013 "Beyond Postcolonialism and Postpositivism: Circulation and the Global History of Science." *Isis* 104.2: 337-347.
Roberts, Lissa L.
2009 "Situating Science in Global History: Local Exchanges and Networks of Circulation." *Itinerario* 33.1: 9-30.
Shapin, Steven
1995 "Here and Everywher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 289-321.
Shen, Grace Yen
2014 *Unearthing the Nation: Modern Geology and 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lbur, C. Martin
1943 "In Memoriam: Carl Whiting Bishop."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2.2: 204-207.
Winegrad, Dilys P.
1993 *Through Time, Across Continents: A Hundred Years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at the University Museu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Muse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三・網路資訊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ttp://www.oed.com/view/Entry/69922?rskey=jhgc5Q&result=1#eid，檢索 2017.12.16。

洪廣冀

Carl Bishop, Li Chi, and the "First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in China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

Kuang-Chi Hung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ith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Chinese archaeology,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conducted at Hsi-yin Tsun, Shanxi, by Li Chi (also romanized as Li Ji, 1896-1979) and Yuan Fuli in 1926 is well known for being the "first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in China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 Even so, scholars have yet to examine the individual whom Li claimed was the one he had most appreciated and without whom the expedition to Hsi-yin Tsun could not have occurred: Carl W. Bishop (1881-1942), curator at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Li believed that Bishop's focus was on scientific excavation and that the undertakings with which Bishop occupied himself in China represented the true spirit encapsulated in the motto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namely "for the increase and diffusion of knowledge." Bishop was by no means "an ordinary collector of antiques," Li told his readers, and it was Bishop's incessant support that enabled Li to carry out the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to Hsi-yin Tsun to a satisfactory end.

The present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excavations conducted by Bishop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ased on archival material currently housed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the Penn Museum),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chives,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t details who Bishop was, his associations with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d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how these associations as such brought Bishop to China, and how—and why—Li Chi received Bishop's incessant support.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Columbia- and Harvard-trained Bishop came to China in March 1923 to realize a plan for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nitiated by the Smithsonian; that is, Bishop was to collaborate with scientific communities in China to excavate sites with great archaeological potential and then share the findings evenly among the involved parties. In so doing, the Smithsonian expected that the institution could not only enrich its collections and assist

the American public in understanding "the high ideals of beauty" by exhib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findings excavated in China, but also preserve those archaeological sites which had been ravaged for decades by the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like. However, when Bishop attempted to contact scientific communities in Beijing to set the above proposal in motion, he realized that due to a collaborative plan that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Swedish geologist Johan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 had been working on, the Smithsonian could hardly find a niche within Chinese archaeology. Consequently, from his arrival until April 1927, Bishop engaged himself in maneuvering around and surmounting the already established cooperative network, while building a new one from scratch with the Smithsonian occupying the center. After a series of failed attempts, Bishop finally had a breakthrough: the employment of Li Chi, who had just received his PhD in physical anthropology from Harvard, and the reliance on him to organize the "first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 Returning to a statement Li made in 1926, this article unveils the knowledge politics and power struggles that occurred as Bishop devoted himself to actualizing the Smithsonian's "true spirit." Moreover, by investigating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Bishop and his superiors, I argue that Bishop's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was not as innocent and selfless as Li might have believed. Bishop continuously purchased Chinese antiquities from related markets and, thanks to the Smithsonian's status as a national institution, avoided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Chinese officials, relying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network to export the relics to the Smithsonian.

Benefiting from recent research conducted by historians of science and schola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STS) concerning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an assemblage theory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article, in one respect,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the abovementioned archival material, and in another, engages in a close dialogue with the history of field science. Although the history of field science has become a thriving subfield with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his paper argues, researchers working within this field largely remain concerned with what scientists had done *in* the field, instead of how they had constructed a site *as* a field for science. I thus demonstrate that as long as researchers are able to scrutinize what constitutes a field from an ontological

viewpoint, rather than confining themselves to what takes place in the field as if it was merely a stage, they can better answer why a “field” becomes such an important site for produc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nsofar as the historiography of Chinese science is concerned, show the heterogeneity of and heteroglossia in the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modern science became institutionalized in China.

Keywords: Carl Whiting Bishop, Li Chi, archaeology, fieldwork, assemblage